從澳門城市建築看中西文化交融

陳澤成*

澳門以其特殊的地理條件、歷史成因及社會人口構成，開埠西百多年來，既發揮了作為著名東西方貿易港口的作用，也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澳門的城市建築在某些方面則集中反映了中西文化的相遇、碰撞和融合。

本文主要通過從開埠至1848年間澳門的城市建築來論述中西文化的交融，其中包括澳門的地理概況、各類建築物的創建和發展以及城市區域的形成和發展等。全文共分成三部分：一、“澳門城市發展概述”，通過近代考古發掘的成果來說明珠江三角洲的形成，特別是珠江三角洲西邊的濱海線不斷外移，從而形成了澳門半島特殊的地理條件，在此前提下對澳門城的建立和發展做了概述；二、“澳門的城市建築”，主要論述澳門城市建築的創建和歷史演變，將1848年前主要的歷史建築分類進行論述，其中包括教堂、廟宇、炮臺和民居；三、“從澳門城市建築看中西文化交融”，首先論述澳門天主教城和華人居住區的形成和發展，然後把兩者作為一個整體來論述中西文化在都市格局、街區和單幢建築物上的融合。最後得出的結論是，中西文化交融的歷史過程形成了澳門的文化特色，其特點是同時具有開放性與包容性，而澳門文化特色又普遍在城市的建築格局中顯示出來。

前言

在澳門城市建築研究方面，澳門著名歷史學者文德泉（Manuel Teixeira）神父發表了大量有關歷史的著作，尤其是教堂和街區的歷史。還有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女士對澳門歷史資料進行梳理而編寫的澳門編年史。他們的著作在澳門城市建築方面，具有重大的參考價值。近年來，有關這方面的研究越來越受到學者的關注和重視。在城市建築歷史方面，如科斯塔（Maria Costa）的《澳門建築史》、巴拉舒（Carlos Baracho）的〈澳門中世

紀風格的形成過程〉和湯開建的〈明代澳門城市建置考〉等。在建築文化方面，如王兆君（Wong Shiu Kwan）的〈澳門建築：中葡合璧相得益彰〉和布爾奈（Diogo Burnay）的〈變動與建築：澳門的建築與殖民主義〉等。還有考證方面，譚世寶對澳門開埠前的“村”和澳門三大廟宇的考證等。

澳門作為中國近代史上一個中西文化的交匯點和中轉站，這是得到眾多學者承認的。因此，中西文化的交匯或交融對澳門的城市發展有甚麼貢獻，澳門的城市建築又如何反映中西文化的融合，這是本文嘗試論述的課題。建築物是一個社會最具立體感和質感的表現。建築與社會的關係可引用下面這

* 陳澤成，汕頭大學信息工程學學士，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歷史學（中外關係史方向）碩士，現任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文化財產廳廳長。

段話說明：“建築差不多是一個國家完美的歷史記錄，每一座建築物都能捕捉那個地方的氣候、地理及該社會的經濟、科技和政治情況，和人民的道德價值、哲學思想、美學觀。”⁽¹⁾從澳門保存下來的大量建築遺產，我相信可以從中獲取足夠的信息進行有關課題的研究。

本文試從時間、空間和文化三個層面進行論述：從時間上區分，本文的研究範圍是從澳門開埠至1848年，這是由於有關1848年後的近現代城市發展的論著較多，而且政府檔案和文獻都有詳細的記載；從空間來區分，本文的研究範圍集中在澳門半島，並以分層的方法去論述，首先是澳門整體城市發展的概述，然後是從各類建築的促述到城市區域的形成和發展的論述；從文化層面上研究，是以城市區域的形成為基礎，通過各類建築物所代表的文化背景及其文化內涵在同一城市空間的共存和融合，最後是評估這種共存和融合所形成的普遍價值。

就本論文的學術價值來說，論文的選題是在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導師李金明教授所長期專注從事的“中外關係史”研究方向下的一個重要的分支課題——中外文化交流史。在導師的諄諄指導下，本文第一次嘗試從澳門的城市建築遺產來論述中外文化交流，進一步肯定了建築遺產對形成獨特城市文化的貢獻。在有關澳門的學術研究方面，希望能夠推動對澳門建築遺產的研究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另外，在論述的過程中，從地理環境的形成、社會經濟因素和廟宇的創建來論證，否定了澳門在開埠前已有“村”存在的問題。

目前，澳門正在進行世界文化遺產的申報工作，澳門的建築遺產所體現的中西文化交融，論證其所代表的普遍文化價值，對澳門的申報工作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同時，中國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將面對經濟全球化和外來文化的巨大衝擊，本土文化如何應付競爭，各個城市的發展方向如何定位，這些都是極為迫切需要開展的研究課題。有關這方面課題的研究，澳門正是其中一個活生生的案例。澳門作為近代中國面對經濟全球化的

第一個海港城市，在遭到外來文化的衝擊下，各種文化如何交匯、碰撞和融合，以及如何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化環境，澳門如何成為一個非常成熟的模型，等等，它們將一一涉入本論文對澳門文化的解讀，希望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本人從2000年開始參與香港大學建築系的建築保護課程的教學工作，而從前年開始為了統籌澳門歷史建築群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工作，面對大量而複雜的工作使本文的撰寫拖延了一年時間。在此非常感謝李金明教授的悉心指導和一再催促，還得感謝香港大學建築系龍炳頤教授的不斷鼓勵，使我終於能將這篇論文提交出來請師友同事不吝指正。

澳門城市發展概述

一、地理概況

澳門位於中國東南沿海，地處廣東省珠江和西江三角洲的南端，毗鄰珠海市，北距廣州市145公里，東距香港特別行政區約78公里（約42海里），其區域範圍位於東經113°31'36"-113°35'43"左右，北緯22°06'39"-22°13'06"。

澳門地區由澳門半島、由仔島和路環島所組成。由仔島位於澳門半島東南偏南約2.5公里，路環島則在由仔以南約2公里。澳門地區總面積約25.66平方公里，其中澳門半島8.61平方公里，由仔島6.54平方公里，路環島7.56平方公里，路環與由仔之間的路由城約2.95平方公里。⁽²⁾澳門面積相當於香港的六十三分之一、新加坡的三十七分之一，從地域規模來說，是一個相當狹小的城市。

澳門地區地勢不高，以丘陵、台地為主，其地理形成與珠江三角洲的形成密不可分。珠江三角洲是在海侵、海退的多次旋回中發育起來的。據地理學家分析，距今約40,000-32,500年，珠江三角洲全境為陸地，西江、北江、東江、潭江等河流下切，形成平行嶺谷地貌。距今32,500-22,000年，珠江三角洲約有1/5面積被海侵，海水沿河谷入侵，構成三條溺谷。距今2,2000-7,500年，南海海面大幅度下降，珠江三角洲全境又上昇為陸地。距今7,500-5,

000年，再次發生海侵，整個珠江三角洲重被海水淹沒，當時的右海岸線至少延伸至廣州及佛山一帶，溺谷灣深入羚羊峽東面的廣利。同時河口發生淤積，河水及海水帶來的泥沙充填溺谷，形成近代三角洲平原。⁽³⁾在近代珠江三角洲平原形成以前，澳門地區祇是幾個孤懸大海遠離陸地的小島。隨着近代珠江三角洲平原的形成和濱海線的不斷外移，澳門地區也慢慢地向陸地靠近，成為珠江三角洲的一部分。

距今4,000年前後的濱海線，亦即是新石器晚期的海岸線。這個時期的海岸線，隨着珠江流域上、中游人口逐漸增加，水土流失加快而不斷淤積前伸。經過約兩千年的淤積，西、北三角洲的濱海線已推進至順德縣的龍江、都寧、西海，番禺縣的紫泥、沙灣、市橋、石樓、蓮花山、化龍和廣州東郊南崗一帶。⁽⁴⁾距今約2,200年前的漢代濱海線，通過考古發掘，在西、北江三角洲中部的順德縣發現了多處漢代遺址，因此可以推斷當時的海岸線位於現順德市附近。至唐代距今約1,400年的濱海線，通過考古發掘發現石棋南沙涌口有唐代王博墓，而且廣州東郊廟頭村隋代已建南海神廟（菠蘿廟），因此，唐初西、北三角洲的濱海線大致在南華—昌教—龍涌—桂州—石棋—廟頭附近。⁽⁵⁾至宋代距今約一千年的濱海線，西、北江三角洲的濱海線大致在新會的雙水—小岡—禮樂—江門外海—中山的古鎮—曹步—小欖—大黃圃—潭州一帶。⁽⁶⁾明代濱海線繼續南移，並已靠近五桂山（香山島）。隨着三角洲的進一步淤積前伸，清代初期，五桂山已把西江出海和北江出海口分隔為一西一東。

澳門原為於香山島南隅懸於海中的孤立小島，後因珠江三角洲西邊的海濱線不斷南移，從西江帶來的泥沙不斷地淤塞堆積，形成了一道長約200米的砂堤與香山島連接，使原來的澳門島變成一個半島。因此，通過上述珠江三角洲的形成發育過程和澳門與香山島之間的地理關係，我們可以確定在澳門開埠以前，澳門祇是香山島的一部分，澳門諸名當然就不見於經傳。根據薛韞《壘門記》載：

自香山縣鳳樓嶺迤南，凡一百二十里至前山，又二十里為濠鏡澳。不至澳六七里，山嶄然斷，式沙堤如長橋，曰蓮花莖。莖末，山又特起，名蓮花山。又伏又起，中曲坳，長五六里，廣半之，直狹良，是稱澳焉。⁽⁷⁾

澳者，舶口也。因之，澳門當時為香山的舶口之一。

澳門原是懸於海中的孤立小島，後因西江帶來的泥沙堆積，形成了一道長約兩百多米的砂堤與大陸連接，使原來的澳門島變成一個半島。18世紀中葉，澳門半島的西側已經進行了一定規模的填海工程。但是，當時於西北角的青洲還是一個小小的離島，已修建了路堤與半島連接。後來經過一系列的填海工程，澳門才發展成為現在的地形。澳門半島三面環海，南北長約4公里，東西最寬約2公里，中有小山丘，從東北到西南分別是望廈山、東望洋山、西望洋山和媽閣山。此外，中部還有大炮臺山，西北有青洲山，東部有馬交石山等。其中以東望洋山為最高，海拔約90米，山頂建有東望洋燈塔。

澳門半島在珠江出海口的位罝，在它西北一公里許，有個鬱鬱憾憾的小島，名叫青洲。在它的東方，近有東澳山、九星洲及九洲洋，還有伶仃山及伶仃洋，更遠處是通往廣州的門戶——虎門。在它的西方，有對面山、馬騮洲、燈籠洲、文灣山、磨刀山等大小島嶼星羅棋布，並有通往廣州的另一個門戶——虎跳門。在它的南方，有舵尾、雞鷄、橫琴、九澳等四島面面相對，海水縱橫其中，成“十”字狀，故稱之為“十字門”。

從澳門的地理位罝和珠江三角洲西邊的地理變化來分析，地理環境直接影響到澳門城的建立並限制它的發展，同時也形成了澳門城獨一無二的海港文化特色。

二、澳門城市的建立與發展

澳門雖然是一個小城市，但自16世紀起，國際的、區域的和本土的歷史變化在這裡有最實際和敏感的反映，形成了澳門最獨特的城市風貌。

1999年12月20日以前，澳門處於受葡萄牙行政管轄的政治狀況。幾個世紀以來，澳門一直受到東西方多種文化（亞洲、地中海和非洲）的影響。

根據20世紀80年代澳門的考古發掘報告，發現了從新石器晚期的夾砂陶、漢至六朝的五銖錢、唐宋的青釉陶到清朝的銅錢等，證明澳門海島有人類活動的時間可追溯至5000-6000年前，而且與珠江三角洲古越族先民文化休戚相關、一脈相承⁽⁸⁾，也證明了在葡萄牙人到達以前，澳門地區已經有人類活動的存在。

澳門開埠前的“澳門地區”⁽⁹⁾已屬於中國領土，這是無可置疑的。但是直到明朝中葉澳門開埠以前，這裡並沒有形成一個地方的行政區域單位，充其量僅是一些自然形成的、人煙稀少的聚落而已。⁽¹⁰⁾

1511年葡萄牙佔領馬六甲，通過與當地的中國商人進行貿易，取得了大量的中國貨物轉販至歐洲，賺取鉅額利潤。為了更大的利益，葡萄牙人積極尋找取得與中國進行直接貿易的途徑，繼續拓展其在遠東地區的貿易航線，另一方面通過葡萄牙與羅馬天主教教廷的協議，發展在中華帝國的傳教事業。因此，從佐治·歐華利（Jorge Álvares）於1514年第一次到達珠江口的屯門島（Tamão）作試探，隨後1517年葡屬馬六甲總督第一次遣使中國，要求與明政府建立定期貿易關係被拒，經雙方武力較量而從浙閩一帶敗走，直至1553年才開始在澳門取得立足點⁽¹¹⁾，從而打開了東方與歐洲關係的新篇章，把澳門作為日本、印度貿易的轉運港和商站，為這些航線提供商品和市場。

有關葡萄牙人如何開始在澳門居留的歷史，眾說紛紜，直至今天仍然缺乏一個確定的日期。唯一無可爭議的事實是，葡萄牙人於16世紀中期來到澳門，自此以後的四百多年裡，儘管澳門經歷了幾次的經濟興衰，葡萄牙人都從未離開過澳門。在鴉片戰爭以前，葡萄牙人在澳門從事的所有活動都受到明清政府的制約，包括城市建築方面。明朝政府於1573年建立關閘的目的，就是為了更好地控制澳門的葡萄牙人。

葡人剛到達澳門時，澳門半島祇有稀少的流動人口聚居，並沒有形成村落。葡國人開始在內港地區建起了簡陋的土木結構建築物。由於教會的力量起了主導的作用，首先建起的公共建築物就是木結構的教堂。葡人的住宅群慢慢地教堂的周圍建立起來，並輻射出去，形成了澳門的城市雛型，也即是天主教城的雛型。那個時期的葡式住宅和公共建築現在已不存在，甚至連有關的圖象記錄也沒有留下。城市逐漸形成之後，隨着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教堂就不再是簡單的土木建築，而是具有一定水準的磚石結構。在1562-1634年間，葡人在澳門投資興建了一系列教堂，先後建成聖保祿（大三巴）、聖望德（瘋堂）、聖老楞佐（風順堂）、聖方濟各（伽思欄堂）、聖奧斯定（龍嵩廟、大廟）、聖多明我（板樟堂）、聖安多尼（花王廟）和聖嘉勒修院（尼姑廟）等八座教堂。繼教堂之後又建起的公共建築物有市政廳、仁慈堂等。17世紀後，為了防禦其它西方列強的進攻，葡萄牙人陸續地修建了大大小小的炮臺和城牆。先後建成伽思欄炮臺、南灣炮臺和小炮臺（沙梨頭炮臺）、大三巴炮臺、東望洋山炮臺（松山炮臺）和西望洋山炮臺、媽閣炮臺和聖地亞哥炮臺，這些都是在明朝政府不允許的情況下進行的。但是由於1622年荷蘭人發動的進攻，使明朝政府默許澳門炮臺和城牆的存在。不過，澳門的城市在17世紀末和整個18世紀基本上沒有甚麼發展。其原因一方面是澳門經歷了嚴重的經濟衰退；另一方面清政府在1749年宣佈未經批准不得在澳門建造新房，祇允許對既存的建築進行必不可少的維修工程。同時，城外的中國居民點不斷增加，人口不斷膨脹。直至18世紀後期，由於清政府政策的改變，以及鴉片貿易所帶來的鉅額利潤，一些吸收了巴洛克風格的建築物才陸續建成，如聖若瑟修院教堂。19世紀初，教會重組後，重建了主要的教堂，用耐用材料代替了以前的土坯，如聖老楞佐堂、聖奧斯定教堂和聖嘉辣教堂。澳門作為一個鴉片貿易的中心，很多外國公司的到來，造成很多具有高水平的新型建築在南灣興建起來，包括豪華的別墅、商業樓宇等。這個時期可以說

是澳門城市建築中最輝煌的時期，澳門成為遠東地區最繁華、最漂亮的花園城市。

隨鴉片戰爭的結束，香港的開埠，澳門作為中外貿易商業港口的優勢也隨之失去。此外，由於清政府的衰弱，澳門漸漸地從政治上擺脫了清政府的控制。葡萄牙政府從根本上控制了澳門，教團組織被取締，市政廳也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總督掌握實權，代表了葡萄牙政府在澳門的行政管理權力。於是，政府可以推出一系列具有連續性的城市發展和改良計劃，澳門從此開始有了整體的城市計劃。當時最重要的工程包括修建望廈馬路、內港和西望洋山的填海、開山和築路。

19世紀後期，澳門作為移民和苦力貿易的中心，經濟又再度活躍起來。同時，澳門繼續成為西方各殖民者的渡假勝地。許多豪華住宅均出現在這個時期，這些樓宇既具有城市的風貌和中國式的空間結構，又有西方古典式的拱形騎樓、裝飾、中楣、三角楣、主柱、壁柱及柱頂盤。在公共樓宇和機關樓宇中較為突出的是伯多祿五世劇院、仁伯爵醫院、陸軍俱樂部、水警兵營、峰景酒店、衛生司辦公樓、警察廳和鏡湖醫院。形式的選擇基於各種不同的風格，從古典折衷主義到西方的裝飾復興主義。另外，中國傳統建築在城市和原來華人村落的聚居點繼續發展。修葺、新建和擴建了一些廟宇，如沙梨頭的關帝廟、土地廟和包公廟、大炮臺山坡的哪疍廟，以及馬交石附近的天后廟。在商業區出現了一種新型的中式建築——塔型當舖磚樓，其外形像炮樓，有小氣窗和波浪形的塔頂，與珠江三角洲一帶的炮樓建築相似。

20世紀初期，城市開始大興土木公共工程，包括填海擴地，建造碼頭港口和公路，抽乾沼澤地、安裝公共照明以及興修花園等，還有建設縱橫交錯的馬路網區，供水系統和下水道系統。新馬路就是建於1920年，並一直成為澳門最主要的馬路。而澳門建築文物最主要的風格之一——現代主義於20世紀30年代傳入澳門，在新馬路的周圍到處可以看到體現裝飾主義風格的建築物。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政府將城市建設的控制權交給了唯利是圖的投

機商和發展商手中，澳門原來的城市風貌又慢慢地被毫無美感的盒式建築物所侵蝕和破壞。與此同時，澳門政府長期以來沒有一個長遠的都市化和現代化的城市規劃，在現代化和都市化的過程中沒有保護和配合原有的歷史城區，使很大部分的文物建築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澳門文化財產保護法令的頒佈才見轉機。

澳門的城市建築

一、教堂建築

1) 聖安多尼教堂 (Church of St. Anthony)

聖安多尼教堂座落在聖安多尼廣場，位於賈梅士花園 (Luís de Camões Garden) 所在的小山丘上，在舊沙梨頭堡壘一側，教堂正門朝向為西南方，與賈梅士前地構成一直角，它是澳門最古老的三間教堂之一。在《澳門記略》一書中，張汝霖和印光任提到了這個教堂：“北隅一廟，凡蕃人男女相悅，詣神盟誓畢，僧為卜吉完聚，名曰花王廟。”⁽¹²⁾因此華人都叫該堂作“花王廟”（花王堂）。

據施白蒂女士的看法，它可能是澳門的第一座教堂，教堂的雛型建於1562年。⁽¹³⁾有關聖安多尼教堂的建立時間，其它文獻的記載是在1565年耶穌會傳教士建造第一所住宅時，其雛型就已經存在。按照蒙塔納神父 (Padre. Montanha) 的說法：“靠近聖安多尼小禮拜堂，用茅草蓋成了第一座教堂，與澳門其它民房無異。”⁽¹⁴⁾耶穌會傳教士多明戈斯·桑托斯 (Domingos dos Santos) 在其名為“澳門遠東第一所西方大學”的著作中這樣寫道：“1565年年底，耶穌會的寓所由佩羅·金特羅 (Pero Quinteiro) 家遷往其它的住宅。這些住宅同樣也是土房，以木頭和稻草作為屋頂，靠近簡陋的聖安多尼小禮拜堂。”⁽¹⁵⁾

從上述的文獻記載可以證明聖安多尼小禮拜堂在1565年就已存在，而在它附近的聖安多尼教堂則是於明嘉靖四十四年 (1565) 創建。我們看到該教堂所在的地理位置，剛好是俯瞰狹內港的沙梨頭之

上的大炮台山坡西南邊的背陰面，可能是葡萄牙人在澳門形成聚落的第一個地區。

文德泉神父提到，該教堂在1608年進行了重修，其門樓前壁的一塊石頭上刻姓字。⁽¹⁶⁾不過，正如現存教堂庭院的石頭十字架所示，第一座石頭的教堂建於1638年，就在現存教堂的原址上。⁽¹⁷⁾

18世紀開始，由於荷蘭和英國在遠東地區的競爭，葡萄牙失去了海上霸權，與日本的商業貿易也斷絕了，加上荷蘭人奪取了馬六甲，使澳門陷入了衰退之中，教會的收入隨之也大幅度減少。此外，由於澳門經常受到惡劣天氣的侵襲，在襲擊澳門的多次颱風中，1738年的那一次特別猛烈，澳門的大多數教堂遭到嚴重的損壞。⁽¹⁸⁾

1739年被唐·若奧五世(D. João V)任命為澳門主教的伊拉里奧·德·聖·羅薩(Hilário de Santa Rosa)修士，應教皇本托十四世(Bento XVI)的要求，對當時澳門教區的情況作了以下的描述：“萬能的十字架(果阿之神)……我主上帝在召喚我，特別是現在在印度省損毀情況非常嚴重的情況下，看來，我注定是在它瀕死前給它塗油祝福而不是去統治了。”主教堂以及一些其它教堂的損壞極為嚴重，基督徒的宗教活動無法正常進行了。⁽¹⁹⁾

經過一段時間以後，聖安多尼教堂和其它教堂的修復工作得到了澳門市議會的支持。1795年，印度總督給澳門市議會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它修復聖安多尼教堂和聖老楞佐教堂。有一封寄往印度的日期為1797年12月28日的信，要求印度方面批准修復這兩座教堂的工程計劃，表明市議會已經遵守了印度總督的命令。⁽²⁰⁾

與澳門所有教堂的命運一樣，聖安多尼教堂在1809年也遭受了大火焚燬。過後，在羅馬天主教徒和非羅馬天主教的基督徒的捐助下，教堂於1810年得到重建。⁽²¹⁾1874年的颱風及以後的大火使教堂受到破壞，教堂在清光緒元年(1875)又進行修建，其規模一直保存到現在。

1930年教堂再次進行了修復，似乎就在這一年，塔樓和前壁作了重大的修改⁽²²⁾，後者使用了當地人叫作“水刷石(Shanghai Plaster)”的類似麻

石的材料作飾面。在唐·若瑟·科斯塔·努內斯(D. José da Costa Nunes)任澳門主教期間，聖望德教堂、主教堂和聖若瑟修道院教堂的前壁也作了同類的改動。

關於1638年前教堂的建築形式，我們現在知之甚少或一無所知。1810年的情況也如此，祇知道牆壁是用板條和灰漿建成的，這是19世紀初澳門建築中廣泛使用的一種材料。⁽²³⁾到了19世紀後期，這座教堂可能成了當時一座比較惹眼的宏偉建築，就像當時印度省的所有其它教堂一樣，用雪白的灰漿塗牆，描畫裝飾。這種方式在這個地區持續了一個半世紀。

現在的教堂祇有一個中殿，儘管在1930、1951和1953年分別修復過，而且加以很大的改變，但考慮到其內部使用的材料，用雪白的灰漿粉刷，木屋頂上面的天花有打孔的窗花格，供屋頂通風之用，故相信它仍然保持了1875年修復工程中引進的殖民風格。

教堂祇有一座鐘樓，主門樓前壁頂上是一個三角形的山牆，正中有一個壁龕，壁龕內有一座里斯本聖安多尼(Saint Anthony of Lisbon)的塑像。聖安多尼於1195年生於里斯本，原名叫費爾南多·布良斯(Fernando Bulhões)，是馬丁·布良斯(Martim Bulhões)和特蕾莎·塔維拉(Teresa Taveira)的兒子，是葡萄牙最廣為人知的聖徒。

龍思泰記述了人們在6月13日慶祝聖安多尼節的情況。這個節日要延續十三天，遊行活動富有軍事色彩。這位歷史學家寫道：“至少到1833年為止，聖安多尼像就由神職人員、總督、貴族和軍隊護衛。他的塑像由四名軍官抬舁，歷時十三天，每天早上士兵們都等在教堂，以向他表示敬意。遊行前一天，市議會提供240兩銀子⁽²⁴⁾，剛好是一名陸軍上尉的年薪，給教區的全體居民，供清潔和宗教活動之需。聖安多尼是受人歡迎的聖徒，特別是在海員之中。有時，崇拜者會因敬慕而跪下雙膝，以企求聖安多尼保佑。但由於求拜者心情迫切，他們認為聖安多尼高傲地拒絕了他們的企求，或者有意耽延實現他們的願望，於是，聖安多尼像便從座基上

被拿了下來，受人詛咒和鞭笞，受人虐待。另一方面，如果祈禱者認為聖安多尼顯靈保護了他，就對聖安多尼像三磕五拜，愛護備至，不停地在塑像前燒香點蠟。”⁽²⁵⁾

2) 聖老楞佐教堂 (São Lourenço Church)

聖老楞佐教堂座落在風順堂街上，位於聖奧斯定堂和聖若瑟修道院 (São José Seminar) 所在小山的西南坡，前面就是南灣宮 (Praia Grande Palace，即今澳督府)，座北向南。它是澳門三個最古老的教堂之一，是葡萄牙人的航海保護神。在《澳門記略》一書中，張汝霖和印光任提到了這個教堂：“此外西南則有風信廟，蕃舶既出，室人日歧其歸，祈風信於此。”因此華人稱此教堂為“風順堂”。

若瑟·熱蘇斯·馬利亞 (José de Jesus Maria) 教士說：“從1559年到1560年，正如回憶錄中所記述的，在耶穌會神父的參與和大力幫助下，澳門已經建造兩到三座教堂，即聖老楞佐教堂和聖安多尼堂……”⁽²⁶⁾ 據多份歷史記事、文件和歷史學家的記述，我們可以斷定，自1557年澳門“正式”建立到1560年，在很短的一段時間內，最長不超過三年，這三座教堂事實上就已建成。開始時這些教堂的面積都不大，使用了一些易朽性的材料，如使用木板作牆身和以草料作屋頂。聖老楞佐教堂區是由澳門耶穌會教士在1558年到1560年間建成的。

從龍思泰在1832年仍然見到教堂正面牆壁上的一段碑文可以斷定，教堂在1618年進行了重建。⁽²⁷⁾

澳門最古老的聖母救贖 (Nossa Senhora dos Remédios) 兄弟會就是於1626年在聖老楞佐教堂成立的。⁽²⁸⁾

1792年，根據唐·馬利亞 (D. Maria) 的指示，聖老楞佐堂、主教堂和聖安多尼堂獲得了每年五十兩白銀的補助。⁽²⁹⁾

1798年，根據印度總督1795年頒佈的一項指令，聖老楞佐堂進行了修建，修建工程由澳門市政廳主持。⁽³⁰⁾

據文德泉神父記載，聖老楞佐教堂在19世紀進行了三次重建或大型的維修工程。這三次維修計劃

中，第一次在1801年到1803年之間進行。由於這個時間很靠近1798年，這次維修與上文所指的那一次很可能就是同一次。第二次，也就是形成現在留存的教堂基本形狀的這一次，發生在1844年到1846年之間，維修工程由澳門建築師若澤·托馬斯·阿奎諾 (José Tomás de Aquino) 主持。⁽³¹⁾

1897年到1898年間，教堂進行了該世紀內的第三次維修，這次維修工程由公務司主持，公務司的司長是工程師阿布雷烏·努內斯 (Abreu Nunes)。20世紀也進行過多次維修，1954年進行了一次，最近的一次是1966年進行的，完全由澳門教區出資，對教堂進行了重大的保護性維修。

聖老楞佐教堂是雙塔式建築，教堂建在一高大的花崗岩花園平臺上，教堂正面前有兩邊雙合式臺階連接外面街道。教堂主立面可分為三部分，兩側聳立方形塔樓，塔高21米，右邊裝置大時鐘，左邊設有大銅鐘，中間部分高度為16.5米，低於塔樓，下層為主入口，上層為唱詩臺之大窗，往上則是三角形山花，山花上則以橢圓形徽號收結。建築物為新古典主義風格，教堂主體平面呈拉丁十字形，其長軸為37米，短軸為28米，短軸兩邊為小禮拜堂，長軸主要由祭壇區及主堂組成，祭壇區及小禮拜堂之屋頂都是混凝土穹窿。主堂長27米，寬15米，中間並無立柱，跨度之大為同時期教堂所少見。“人”字形坡屋頂結構直接承托於牆體。屋脊高21米，檐口高17米。瓦屋頂被一木製拱形假天花板遮蔽，假天花板漆成藍色，並以具透氣作用的鏤空花線作平面上之劃分，打破大面積之單調。主堂兩側牆上有稍為突出之科林斯式壁柱，壁柱間開有彩色玻璃窗，上面刻畫的宗教故事既增加宗教特性又可調柔室外陽光，而在各窗上面，位於牆頂處，又相應地開有圓形玫瑰窗，既可採光也可透風。教堂之唱詩臺設在門口入口上方，其結構也以木為主要材料，其屋頂為石製，較主堂屋頂為低。

教堂內部裝飾得宏偉優雅，與聖奧斯定堂、聖安多尼堂和聖玫瑰堂表達的氣氛和情致極為相似，因此，它完成的時代肯定也與前三者差不多，即在1874年到1898年間（聖玫瑰堂1874年，聖安多尼堂

1875年，聖奧斯定堂1874年到1887年），但其更多樣化的設計則似乎是1897-1898年改造工程的結果。

3) 聖母望德教堂 (São Lázaro Church)

聖母望德教堂位於大炮臺山 (Monte) 和東望洋山 (Guia) 相夾而成的山岬臺地上。這塊地方的前面部分原來被稱作“開闊地 (Campus)”，教堂朝向西南。最初，它被稱作聖母望德 (Nossa Senhora da Esperança) 小禮拜堂，而且座落在建於17世紀的城牆之外。1568年耶穌會士唐·貝爾希奧·卡內羅 (D. Belchior Carneiro) 在其旁邊建立一間小醫院為這一帶居住的癲瘋病人服務⁽³²⁾，因為在西方，聖拉撒路是癲瘋病人的保護神，這就是教堂將聖拉撒路 (São Lázaro) 作為其保護神的原因。另外在《澳門記略》的澳門地圖中，此位於城外的教堂標示為“癲瘋廟”，故華人多稱此為“瘋堂”。

城牆將中央大炮臺和聖·亞努阿里奧 (São Januário) 山連接在一起，而且，從這兒到聖方濟各炮臺之間，在望德堂附近，有一座與望德堂同名的城門。

根據同一記述，該教堂與聖安多尼教堂、聖老楞佐教堂都是在1557年至1560年期間創建的。

1576年1月23日，教皇格雷戈利奧十三世 (Gregório XIII) 下詔書建立澳門教區並任命耶穌會士唐·貝爾希奧·卡內羅 (D. Belchior Carneiro) 為署理主教。

在教堂前地一側，至今還有銘文的石座和十字架，上面寫著：“希望十字架，1637年。”

1726年聖母望德小禮堂進行了維修。⁽³³⁾《澳門記略》寫道：“東南城外有發瘋寺，內居瘋蕃，外衛以兵，月有廩。”⁽³⁴⁾

龍思泰認為與聖母望德堂毗鄰的“癲瘋院”，是澳門仁慈堂最早創設的慈善機構之一，直到1834年還有病人69名。⁽³⁵⁾

1885年8月8日總督托馬斯·羅沙 (Tomás da Rosa) 下令拆毀已有二百多年歷史的小教堂，它一直被認作是一座修道院。第二年，在原來教堂的地基上，一座新的教堂建成了⁽³⁶⁾，這是由於在1883年，中國的天主教徒向教會當局請示，要求重建該

教堂的結果。⁽³⁷⁾

查爾斯·博克瑟 (Charles Boxer) 認為，望德堂堂區是在1886年才建立的⁽³⁸⁾；後來，到了1923年，它又被劃作一個“移動的堂區，具有本市其它三個堂區所有的一切榮譽和特權。”⁽³⁹⁾

歷經幾個世紀的風風雨雨，以及17-19世紀以來澳門的總體衰落，聖母望德修道院自然也經過了多次維修。

關於該修道院的繪畫作品為數不少。以時間順序排列，《澳門教堂》一書裡可見到的有威廉·亞歷山大 (William Alexander) 於1792年到1794年與駐華公使麥克卡特爵士 (Lord McCarter) 一起遊覽了中國、克拉克 (Clark) 和華生 (Wathen) 大約在1814年⁽⁴⁰⁾以及喬治·錢納利 (George Chinnery) 在1832年的繪畫作品。⁽⁴¹⁾所有這些繪畫作品中表現的都是一座中型的修道院，建築結構簡潔，是典型的葡萄牙式修道院平面建築，左邊有一座較矮的方形鐘樓，上面覆有四角形金子塔式屋頂，像臺上有檐角。許多繪畫都以周圍風景如畫的環境為背景，這幾幅畫從不同的角度表現了修道院的風貌，揭示了其漂亮裝飾中的不同之處。

現存的教堂是1886年重建的，那時的教堂與聖安多尼教堂、聖老楞佐教堂、聖玫瑰堂和聖奧斯定堂基本相似，是葡萄牙式的殖民新古典風格，拉毛粉刷裝飾，上漆木頭天花板。阿諾索伯爵在1894年前參觀了澳門後，把剛剛經過重建的教堂描繪為“它們是所有教堂中最漂亮和艷麗的”。1967年，它又進行了修建，主要整修祭壇，改建和擴建主教堂，在其兩邊增建了兩道側廊。所進行的內部和外部整修工程徹底改變了1886年時教堂的形貌，教堂的外面全部用“水刷石”塗抹過，這也是其它澳門教堂通常使用的方法，但與澳門的葡萄牙建築的主要特色之一完全相背，即牆壁用拉毛和粘土，裝飾用灰漿、砂和粘土。

山牆的三角面內有環環相扣的半圓曲線，上面有耶穌之心紋章的淺浮雕，頂上是糾纏在一起的皇冠和鐵錨圖案，其間有一雙手掌狀物，上面有兩枚大釘子。

教堂庭院中仍然矗立着原來的十字架，上面鐫刻着“Cruz da Esperança Anno de 1637”（意為“1637年希望之年的十字架”）。

4）大三巴牌坊，前聖保祿教堂（The Ruins of St. Paul's, St. Paul Church）

第一批耶穌會傳教士共三名是在1563年7月29日到達並定居澳門，他們是弗朗西科·佩雷斯（Francisco Peres）、曼努埃爾·特依謝拉（Manuel Teixeira）和安德烈·平托（André Pinto）。他們最先在一位名叫佩德羅·昆特羅（Pedro Quinteiro）的商人信徒家裡落腳，“為教士們改建了兩間舒適的大廳，並擴建了一座遊廊”，“由於最近的教堂也相去甚遠，還為教眾建造了一座祭壇……”⁽⁴²⁾

兩年後的1565年，在現在的聖安東尼教堂附近，又建造了一個居住點。關於這件事，以及將房子和教堂搬到“高於”聖安東尼教堂的過程，多明戈斯·桑托斯（Domingos dos Santos）教士在其著作中如是說：“1565年年底，耶穌會的寓所由佩羅·昆特羅家遷往其它的住宅。這些住宅同樣也是土房，以木頭和稻草作為屋頂，靠近簡陋的聖安東尼堂。這個地點不好，很快就發現需要搬遷。”據說有中國人經常放火焚燒易燃的住宅和教堂，以便偷取裡面的東西。然而就重建而言，葡萄牙人的行政管理卻處於極其無能為力的局面。重建事宜總要取決於中國官員，而中國官員卻對建築物超越臨時性貿易運輸的眼前需要則持反對態度。

不過，耶穌會教士們很幸運，他們最後搬往聖安東尼教堂上面的小山。但那兒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山坡上缺水。巴爾塔薩爾·拉熱（Baltasar de Lage）提供了100兩銀子，在教堂的鐘樓和側門之間挖了一口井。應貢薩羅·阿瓦雷斯（Gonçalo Álvares）的要求，在唐·安東尼奧·維列納（D. António de Vilhena）的干涉下，希望改建一座更寬敞和更堅固的用粘土建成的教堂。但是，中國官員對新建築又表示了反對，他們懷疑葡萄牙人是以建教堂為藉口，實際上是在建堡壘。最後耶穌會通過行賄的方式達到了目的。

1572年至1575年或1578年，為了給越來越多的前往日本、中國或越南東京灣地區傳教的傳教士提供膳宿服務，教堂又擴建了一次。教堂早已有十間通風良好的寬大房間。房間非常舒服，以至於在1579年范禮安（Vallignano）將這座天主聖母堂（Madre de Deus）新寓所稱為印度和遠東地區最好的寓所之一。1582年，佩羅·戈麥斯（Pero Gomes）“讓人給教堂的屋頂蓋上了瓦”。⁽⁴³⁾

很可能聖安多尼教堂之上的這個新址就是後來的天主聖母堂（Madre de Deus）修道院和Assunção de Nossa Senhora教堂所建立的地址。

事實上，1559年到1572年間，佩雷斯神父“曾接到印度省主教安東尼奧·夸德羅斯（António de Quadros）的命令，在澳門為耶穌會教士尋找一個新的住所。這是為了接待接連不斷前往日本的傳教團的需要，他們為了等待季風季節的來臨，往往需要在澳門呆很長的時間。”佩雷拉在其著作的一個注釋中引用蒙塔納神父在Apparatos para a História do Bispado de Macau (Arquivo Histórico Ultramarino, cod. 1695, fol. 259)中的話時還說道：“神父們住所所開的門，那時是與聖保祿學院聯為一體的。”

神父們的住所，連同第一所神學院以及診所，可能就座落在山坡上，就在現在遺留下來的臺階的一側，從這兒可以進入聖保祿教堂的庭院，它同教堂的正面面壁一起，在1602年進行了修繕。如果情況不是這樣，就無法解釋它為甚麼建在正面面壁的中軸線上。考慮到耶穌會教士享受的特權，這一地區可能還有其它屬於他們的建築，所以，這兒就不用不嫉拆毀，而要建造一座宏偉的臺階，以達到盼望已久的宏大的對稱。

由於與日本的貿易不斷增長，澳門的經濟發展非常迅速，所以很有必要在澳門建立一個傳教士的遠東中心，以便在日本、中國以及世界的這個遙遠角落進行傳教。教會的視察員范禮安（Vallignano）力主建造一個相當規模的學院和教堂，他在果阿大力宣傳他的想法，到1593年，在澳門當地人的財政支持下，他的想法變成了現實。

傳教士住所和學院附近的地被填高了，據當時

描述：“由於山體的岩石不能作為地基……因此，山坡上建造了牢固厚實的圍牆，從而形成了一塊很大的地方，用來建造學院和診所。”由於“學院座落在半山坡上”，可以“縱目遠眺”，而且，“山坡保護它不受不祥的惡劣的風的影響，而祇受海上吹來的和風的影響。所以，學院處在了一個清涼的好位置上。”⁽⁴⁴⁾

第一座教堂和學院的工程是由伊納西奧·莫雷拉（Inácio Moreira）負責⁽⁴⁵⁾，他開始了填地和打地基的工作。在范禮安（Vallignano）神父的領導下，工程進展得有條不紊，直到1594年完成。有人如此描述工地現場：“一面巨大的牆壁後面，有兩間很大的房子，房子之間有一個漂亮的院子。房子就像兩個堡壘似地凸出來，房子裡鋪的是木地板。圍牆邊建有走廊和小房間，圍牆建得很氣派，而且很高，似乎有跟房子的屋檐一爭高下的氣勢。走下兩到三個台階，就到了山腳的學校，學校裡也有漂亮的天井和其它工作場所。它們上面還有更多為官員們設置的安排合理的小房間。面對大門還有另一個四面圍住的大院子。這所學院可以容納四十名教士，讓他們舒舒服服地住下。不包括四間校舍，還有十九間小房間，兩間大房子，兩個小教堂和一個佈置精良、面積很大的醫務室。下面還有另外七間小房間。所有其它工作間安排得非常好。神父（巡查官？）決定建造一個新的餐廳，因為現在我們用的這一個是借來的，如果需要，我們有足夠的空間再建更多新的建築物。”

范禮安（Vallignano）神父離開澳門之前，創建了兩個不同的機構。一個是與中國副省區相聯繫的天主聖母堂寓舍，那裡有十名神職人員，由梅西亞（Lourenço Mexia）主持。另一個是附屬日本省區的聖保祿學院，該學院有十九名神職人員，其中包括會務視察員，還有八或十名來自日本的學生和一些來自印度的學生，院長是孟三德神父（Pe. Duarte de Sande）。1597年9月在李瑪諾神父（Manuel Dias）出任院長期間，寓舍與學院合併為一個機構，稱為天主聖母堂或聖保祿學院。⁽⁴⁶⁾

1601年，一場大火摧燬了教堂以及四分之三的

學院。幾天後，一場大颱風又使它遭到損失。當時的院長瓦倫丁·卡瓦略（Valentim de Carvalho, 1610-1604）組織了一批居民，修復被燬壞的教堂和學院。在澳門兵頭的倡議下，全市提供了與日本貿易額的0.5%作為修復教堂的資金（相當於6,260法郎）。意大利熱那亞耶穌會教士卡羅斯·斯皮諾拉（Carlo Spínola）負責整個工程，他後來在日本殉教。工程非常龐大，宏偉的正面面壁花費了募捐來的32,000銀幣。1603年，內部裝飾工程完成。對於整個城市在此次建設工程中的貢獻，教堂一角的一塊石頭上作了記錄，上面刻有：“Virgini Magnae Matri Civitas Macaensis libens posuit anno 1602”。與教堂相連的學院的大門上在1604年建成。正面面壁單獨在1637年完成，裝飾性的雕刻則在1644年完成。教堂的主體於1608年進行修改，聖沙勿略（S. Francisco Xavier）小禮拜堂則到1689年才完成。

1835年1月29日，一場大火燒燬了聖保祿學院及其附屬的教堂，僅剩下教堂的正面前壁、大部分地基以及教堂的前階。當時的《中國叢報》對該次大火作了比較詳細的報導。⁽⁴⁷⁾自此以後，這裡便成為世界聞名的聖保祿教堂遺址（現在被澳門人稱為“三巴聖蹟”，為澳門八景之一）。教堂後部遺址於1837被用作埋葬教士的塋地，至1854年為止。

整座教堂用木板和泥漿（或稱chunambo）建成，至今還保留著宏偉的麻石正面面壁。正面面壁同時並存著17世紀初歐洲風格主義建築因素和中國的裝飾雕塑因素，特別是採用了中國的“龍頭形”滴水嘴。拋開西方原有的教堂內部的建築特色，如拉丁十字形平面，這裡有一個凸出的十字形耳堂和三個用木柱分開的側廊，採用了中國寺廟的建築手法。這一西方建築中採用的最顯著的中國建築技術表現在面壁大門的門框上，這兒的門與門框之間都呈45度角，這是一種顯著的中國木工技術。在西方的建築中，門與門框之間都是呈水平佈置的。聖保祿教堂的門從外面看，與門框間都呈45度角，而從內部看則表現為西方式的水平平置。這一特殊的細節，即石頭被當作木料處理和進行精細的雕刻，照

我看來，是聖保祿教堂保留下來的中國影響甚為顯著的表現之一。

大三巴牌坊的建築由花崗石建成，寬23米，高25.5米，上下可分為五層，自第三層起往上逐步地收分，至頂部則是一底邊寬為8.5米的三角形山花，整個牆壁為巴洛克式，但一些設計或雕刻，卻具有明顯的東方色彩，如中文或象徵日本傳統的菊花圓形等圖案，這座中西合璧的石壁在全世界的天主教堂中是獨一無二的。

牌坊第一層，即入口層，此層共有三個入口，並有十枝愛奧尼柱式支撐及裝飾牆面，大門兩側各三枝，側門一邊各兩枝，小門門楣上有耶穌會縮寫IHS的浮雕圖案，正門上則寫有“MATER DEI”，說明此教堂是供奉聖母；第二層相應是第一層之延續，牆壁由十支科林斯式柱及三個窗口組成，窗楣上均有七朵玫瑰花浮雕裝飾，中間窗口側兩柱間以棕欖樹裝飾，側窗洞兩邊柱間對稱設有壁龕，供奉四位天主教聖人；第三層是裝飾最豐富的一層，並開始收分，牆中央設有一深凹之拱形壁龕，供奉嫉聖母，兩側各有三位天使浮雕，此一層中央共有六枝混合式壁柱，兩側以方尖柱代替壁柱，是下面兩層柱體的延續，各柱間均以淺浮雕裝飾，左邊是智能之樹及一匹七翼龍，其上有一聖母，側有中文“聖母踏龍頭”字樣，而右邊對稱位置上則是精神之泉及一艘西式帆船，上有海星聖母。在柱組外邊是一頂呈弧狀之扶壁，右邊是一骷髏及中文字“念死者無為罪”；左邊則是一魔鬼浮雕，中文則是“鬼是誘人為惡”。此層最外側兩塊牆身是由兩條帶有圓頂之方尖柱，而牆側則設有中國舞獅造型的張開大口之獅子，作滴水之用；在第四層是一耶穌聖龕，兩側有耶穌受難之刑具浮雕，往外由四枝混合式壁柱組成，柱間以天使淺浮雕點綴，柱兩邊有弧形山牆。第五層是一三角形山花，中間有一銅鴿，頂部設有十字架。

5) 聖奧斯定教堂 (Santo Agostinho Church)

聖奧斯定教堂座落在聖奧斯定廣場，它所在的小山頭也是聖若瑟修道院及教堂 (Church of

Seminar São José) 和聖老楞佐堂 (São Lourenço Church) 的所在地。教堂左邊又延伸出了部分建築物，與廣場一起形成了一個直角。教堂的正面朝南方偏東南。在《澳門記略》一書中，張汝霖和印光任提到了這個教堂“龍鬆廟者，在澳西北，初廟就圯，或覆之以蓑，鬚鬆如髯龍，後廟鐘不擊自鳴，眾神之，恢崇其制，仍呼為龍鬆廟。”⁽⁴⁸⁾ 因此華人多叫該堂為“龍鬆〔嵩〕廟”。

早期的奧斯定修道院由兩位西班牙修士於1586年建立，這是在1580至1640年間葡萄牙和西班牙皇室聯合的結果。西葡皇室的聯合對葡萄牙產生了災難性的後果，它由此失去了對印度和遠東的控制。那些地方的控制權轉到了荷蘭人手中。荷蘭是一個剛剛擺脫了西班牙控制不久的新興國家，西班牙帝國的猛然興起使它控制的版圖幾乎翻了一番，同時也使它無法在廣闊的版圖內實施有效的管治，長久維持既有的局面。

由於澳門當地葡萄牙人有一股強烈的反西班牙情緒，也由於希望向中國政府隱瞞當時葡萄牙的政治格局（否則中國政府可以立即將葡萄牙人驅逐出澳門），三年後即1589年，修道院中的教士被葡萄牙教士替代了。

據記載，教堂的修建者弗蘭西斯科·曼內克教士 (Friar Francisco Manrique) 當初在考慮工程如何建設時，曾為巴爾塔扎·阿南·羅保 (Baltazar Arnão Lobo) 法官發佈的一條有關購買建築材料的禁令犯愁⁽⁴⁹⁾，禁令要求，修士住所和教堂的修建祇能使用木頭和草，規格上不能超過長33英尺，寬13英尺。

《澳門記略》書中對於建築材料的描述與澳門早期建築中使用的材料一致，使這兩位中國官員有關原始建築重建的描述變得特別有趣和有價值。這座教堂早已在其目前所在的位置，祇是以亂蓬蓬的茅草覆頂，形狀就像一條條擺動的龍髯。教堂後面大鐘（顯然是指鐘樓）無人看管，即自行鳴響。事實上，據文德泉 (Manuel Teixeira) 神父的記述，教堂建成後五年，即1591年，葡萄牙教士佩德羅·桑塔·馬利亞 (Pedro de Santa Maria)、佩德

羅·聖·若瑟 (Pedro de São José) 和米格爾·桑托斯 (Miguel dos Santos) 把教堂遷移到了現在的地方耶穌會聖花地瑪 (Our Lady of Fátima) 的所在地。聖母恩典堂 (Nossa Senhora da Graça) 也由這些教士修建，而且很湊巧，就在它如今矗立之處。⁽⁵⁰⁾

根據中國官員的記述，聖奧斯定會的教士都剃髮光頭，戴髮冚帽，內穿白色法衣，高領，外層衣服為藍色。⁽⁵¹⁾

這座教堂和修道院與玫瑰堂 (São Domingos) 一道，捲入了耶穌會教士和其它教派教士之間有關“禮儀之爭”的嚴重衝突中。耶穌會教士反對安條克主教 (Patriarch of Antioch) 卡羅斯·托馬斯·馬拉德·托農 (Carlos Tomás Maillard de Tournon) 的追隨者。他曾寫信給中國的教眾，以宗教法庭命令的形式，禁止他們尊崇祖先和儒家規定，而其它東方傳教會的教士則支持耶穌會和保持中國風俗儀式。由於奧斯定和多明我會教士都支持托農，澳門主教若奧·卡薩爾 (D. João do Casal) 於1707年下令關閉了聖奧斯定堂和玫瑰堂。

這一系列衝突發生之後，1712年聖奧斯定堂的管轄權被轉到了教區長的手下。此前，根據印度總督的命令，住持教士已被驅逐、逮捕，並被轉移到了印度的果阿。⁽⁵²⁾

後來，到了1721年，遵照唐·若奧五世 (D. João V) 的御詔，聖奧斯定堂又回到了奧斯定教派教士的手中。同一年，印度總督又下令澳門市議會，對奧斯定教派教士處理聖奧斯定修道院或教堂的事務提供一切幫助。

19世紀，即1874年和1887年，聖母恩典堂 (Nossa Senhora da Graça) 發生了重要的變化。事實上，所有現存室內的灰泥粉飾、祭壇、唱詩班的高臺以及中殿的天花板都是19世紀最後二十五年完成的。現存的鐘樓顯然也是在這段時間內建成的，這座鐘樓的位置與原先的那座剛好相對，在主小教堂的西南面，也許就在舊法衣室的上面，遵循了與聖玫瑰教堂和修道院相同的空間佈置方式。由於主小教堂和法衣室在1874年倒塌，第一次全面修復工作便得以進行。⁽⁵³⁾ 這次修復工作使得教堂的結構安

排和空間佈置都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倣照玫瑰堂的先例，修道院修在教堂的右邊，那兒以前是耶穌會教士的住所。

自1834年傳教活動消失以後，修道院便成了軍隊醫院，直到1874年聖·亞努阿里奧伯爵 (Conde de São Januário) 醫院即山頂醫院建成。此後，它便成了軍隊的營房，直到1893年成立了澳門大會堂。1894年4月，經過重新修復，聖奧斯定修道院歸於受人尊敬的修道院院長的管理之下。⁽⁵⁴⁾

這座16世紀末到17世紀初的教堂，是葡萄牙裝飾主義的建築，遺留下來的所有拇跡無疑祇剩下這個大理石的門洞了。門洞兩邊，有兩對由整塊巨石雕成的柱子，頂上是托斯卡納式的柱頭，支撐門洞上的過樑。除了石門洞外，正面門樓塗抹得濃彩重墨，具有巴羅克殖民遺風，卻又不斷摻雜兩維的圖畫，幾乎沒有留下一絲空間，它反映了19世紀最後二十五年的深刻影響。教堂東側的牆面相當於現在的法衣室的地方，通往唱詩班的高臺和聖耶穌受難兄弟會聚會室之路也進行了粉刷裝飾，但其構架和裝飾的簡潔節制的特點反映了澳門殖民新古典主義的風格。

新鐘樓的頂上有新哥特式的雉堞狀凹處，體現了一種在澳門開始出現的折衷特色，這種後來以不同形式頻繁出現在澳門的其它建築物中，而且常常達到了一種離奇的效果。

目前聖奧斯定教堂建築由主堂、祭壇區及服務區組成，磚石為主要建築材料，祭壇區長20.5米，寬11米。具有濃厚巴洛克色彩的主祭壇緊靠後牆身。其平面呈弧線狀，中間為內凹之壁龕，兩側分別以方形及圓形壁柱裝飾。其中靠近壁龕的兩枝方形壁柱之柱頂更以破山花形式出現。主堂長30米，寬13.5米，平面由兩排科林斯柱劃分為三道縱向空間。各柱間以磚拱相連和牆身共同支撐中式坡屋頂，瓦頂下又設有帶彩繪的木製假天花。兩邊牆身設有小壁龕，牆身上部則開有落地大窗，主要起空氣對流作用，是一般教堂中少見的做法。教堂唱詩臺位於入口處上方，深6米，並向兩沿邊牆延續，而成為一窄長之露臺，露臺在落地大窗位置突出成半圓形平

面，底部有別具特色的花飾襯托。這種露臺設計，主要是考慮到兩側大窗需要經常關閉以調節室內氣溫。

教堂正面設計古樸簡潔，有文藝復興時代的建築影子，兩邊有凸出之方形壁柱，中間開有入口大門，其兩側各為一對古希臘式柱子，上有相同材料之門楣。主面中部開有三個落地大窗，中間一個佔據全層高度，所有窗戶周邊均有簡單白色淺浮雕裝飾。立面最上部分是一山花，山花自立面兩側壁柱頂起收分成三角形狀，中間設有一壁龕，供放圣母像，教堂之服務區建築為兩層高建築，裝飾甚少，聖奧斯定堂整體主要刷以黃色，並以白色油漆飾線及浮雕裝飾，形象較為樸實。

6) 玫瑰堂 (São Domingos Church)

玫瑰堂座落在聖多明我廣場，位於議事亭前地的東北，正門朝向為南偏東南。

1587-1588年間西班牙多明我教派傳教士安東尼奧·阿瑟迪亞諾 (António de Arcediano)、阿隆索·德爾加多 (Alonso Delgado) 和巴托洛梅烏·洛佩斯 (Bartolomeu Lopes) 從菲律賓乘船來到澳門，在曾屬於教區膳食供應人的一間房子內設立了聖母玫瑰 (Nossa Senhora do Rosário) 之屋。同一天，建造了供奉聖母玫瑰的第一座小教堂。這座小教堂完全由樟木建成，所以，教堂的中文名字至今仍然是“板樟堂”。過後不久，根據印度總督唐·杜阿爾特·德梅內澤斯 (D. Duarte de Menezes) 的命令，西班牙傳教士被勒令於1588年3月離開澳門。修道院和小教堂便落入了葡萄牙多明我教士的掌管之下。⁽⁵⁵⁾

現存教堂修建的具體日期，沒有文獻資料記載，但從其建築結構（以中國青磚砌成一米厚的牆壁）來分析估計，它大致應該建於1738年大颱風過後的1739年，“水位的高度在玫瑰堂的正面牆壁上留下了印記”⁽⁵⁶⁾，果阿主教1739年在描述澳門各教堂損壞的情況時有關玫瑰堂的文字中如此說道。然而，很可能在第一座木頭教堂和18世紀建成的教堂之間，還有一座17世紀建成的宏偉的“石頭”教堂，牆壁可能是用板條和灰漿建成的，現存的教堂

在風格和規模上都是其自然的繼承。

上文多次引用過的《澳門記略》一書在提到這座教堂時有下面一段文字：“有板樟廟，相傳廟故庫隘，貧蕃析樟板為之，今壯麗特甚。”⁽⁵⁷⁾考慮到這一描述是1746年作出的，我們不知道它指的是不是最初的教堂。該教堂與澳門的其它教堂一樣，最初也是用木頭建成的，或者它指的是1738年前的教堂，因為文中提到了“現在其規模已頗為壯觀”。

我們知道，到1704年，教堂建了一個“高壇”。這很可能是一個很高的聖壇，對於像聖玫瑰堂這樣有附設修道會的教堂，它常常可以用作去那兒的直接信道。從“高壇”存在的情況來看，18世紀初建成的教堂也很可能是用木板和泥灰建造的，至少在建造主體牆的時候，使用了木材、板條和泥灰混合而成的建築材料，這是葡萄牙人在巴西常用的建築材料，在那兒，人們稱其為“pau a pique”（直譯意為：挺直的木頭）。

除了羅馬天主教和新教在這個教堂裡交叉進行的重大燦爭外，這座教堂和修道院還貫穿一系列值得特別關注的事件，這些事件不僅具有顯著的特殊性，而且在澳門的歷史進程中也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見證了這個地區所經歷的偉大或醜惡的時刻所發生的一切。

聖玫瑰堂與聖奧斯定修道院一樣，深深地捲入了中國的“禮儀之爭”，按照教皇克萊門特十一世 (Clemente XI) 批准的宗教裁判所頒發的命令，中國天主教徒的祭祖儀式是受到禁止的，這最終影響了耶穌會在東方的傳教活動，並對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構成了嚴重的打擊。

1874年的一天，“大約下午4點30分左右，雷電擊中了聖玫瑰堂的鐘樓，使主教堂失火。到晚上10點30分火災最終得到控制時，已祇燒得剩下教堂的圍牆了。雷電過後，暴雨接踵而至，整個城區陷入了一片汪洋之中，最後造成的損失不可估量。”⁽⁵⁸⁾經歷了這場災難性的六個小時的大火和綿延的暴雨之後，整座教堂祇剩下了一片廢墟。之後，進行了重建，留下了現存的內部拉毛粉飾以及刻有19世紀葡萄牙殖民語言的通氣式花飾天花板。

整座教堂由一座中殿和兩座耳堂組成，其間以

方柱隔開，這些柱子也是由大磚建成的，支撐科林蒂亞式的灰泥柱頭上的圓拱門。

教堂的東邊仍然保存了原來與其相連的舊修道院的部分殘蹟，在19-20世紀之交，由公務司司長阿布雷烏·努內斯（Abreu Nunes）工程師對聖多明我街區進行了徹底的維修。⁽⁵⁹⁾

玫瑰堂為一磚結構建築，教堂主要由主堂、祭壇區及一座三層高之鐘樓組成。祭壇區深18米，寬12.2米，設有巴洛克特色的主祭壇。其處理手法與聖奧斯定教堂相同，但其壁柱卻以盤旋形式出現。主堂呈長方形，長32米，寬15米，由兩列各五個券柱式劃分為三道空間。柱子邊長為0.9米，為科林斯柱式，各柱以磚拱相連，支撐拱中式坡屋頂。屋脊高17米，檐口高13.5米，搭接在兩邊側牆上，主堂室內設有木製假天花，天花漆成藍色，間中設有鏤空木條作通風之用，主堂牆身上共有四個小聖龕，兩個在兩側牆上，其餘兩個在分隔祭壇區和主堂的牆體上。兩側牆身上開有十個長方形落地大窗，窗戶兼有窗楣，下層共開有九個門口，其中五個門口直接與側廊相連，主堂側廊位於右邊，寬3米，高4.5米，其外牆被四個拱形大窗完全佔據。側廊之平屋頂是通向唱詩臺之主要通道。唱詩臺設於入口區之上方，深度為7.5米，由兩邊牆體及兩條立柱承托，並沿兩邊牆延伸，成一窄長露臺，以便於關閉兩側牆身上之窗戶。在祭壇右側，側廊之盡頭，是三層高之鐘樓。一樓主要為教堂服務區，二、三樓是展覽廳，陳列自16世紀以來澳門珍貴的天主教文物和藝術品。鐘樓尚保存其原來的木樓板結構及屋頂木結構。在三樓牆洞裡，裝有兩個年代久遠的大銅鐘。

教堂正立面上下分四部分，左右分為三部分。高達20米的三角形山花在中央佔主導地位；其下牆身以一內凹橢圓形宗教徽號浮雕裝飾，兩側有科林斯圓柱及弧形扶壁。立面最下兩部分則是室內空間的反映，其左右三部分空間主要由八支圓形壁柱界定，其中第二層壁柱主要為科林斯式，兩側壁柱頂又設有葫蘆形短柱裝飾。組柱間共開有三個大窗，兩邊稍小且有半圓形窗楣，中間大窗則以灰泥

浮雕代替窗楣。下層設有三個入口大門，均以灰泥浮雕作門楣，其柱式為愛奧尼式，柱基不作粉刷暴露其花崗石材質，在整個黃白色立面中起視覺穩定作用。教堂牆壁主要是黃色，各裝飾線則粉刷成白色，門窗一般為綠色，精緻的灰泥浮雕大量地使用於室內外，尤其是正立面上那些精美的圖案，配以比例合宜的壁柱，令教堂顯得格外高雅華麗。

7) 大堂 (Cathedral Church)

主教堂座落在大教堂廣場上，位於西望洋山、媽閣山餘脈和聖奧斯定堂及大教堂山相夾而成的山岬中，有龍嵩街與其相連，往前延伸，名稱依次變化為媽閣街（Barra Street）、高樓街（Padre António Street）、風順堂街（S. Lourenço Street）、龍嵩街（Central Street）及大堂街（Sé Street）。隨拱新馬路（Almeida Ribeiro Avenue）的建成，這條街就被切斷了，大堂所在的小山與其它山被隔斷了。因此，大堂街與新馬路就祇能通過一段臺階相連。《澳門記略》記：“大廟者，夷人始至澳所建也，在澳東南。”⁽⁶⁰⁾因此華人多稱之為“大廟”。

這是澳門唯一的一座面朝北方的教堂，更準確地說，是面朝北偏西北方。

澳門第一座大教堂所在的位置至今還是個謎，人們有各種不同的意見，有人認為第一座大教堂就是聖母希望修道院，也就是望德堂。

大堂重建於1622-1623年間⁽⁶¹⁾，之前是一簡陋的小教堂。1780年又進行了重修。現今所見的教堂重建於1844-1850年，時任澳門主教的是唐·尼古勞·佩雷拉·博雅（D. Nicolau Pereira de Borja），他的繼任者是唐·熱羅尼莫·馬塔（D. Jerónimo da Mata），後者於1850年2月19日對教堂進行了祝聖，教堂的設計工作是由托馬斯·阿基諾（Tomás de Aquino）完成的，對此，教堂西南牆面有碑文銘記。

1874年該教堂又進行了重大的維修，倡議人是公務司司長弗蘭西斯科·熱羅尼莫·魯納（Francisco Jerónimo Luna）。至少從1862年起，該教堂的朽壞情況就很嚴重了。現存教堂是1962年

重修的結果，其原來的風格受到很大的影響。

8) 聖若瑟修道院教堂 (S. José Seminar Church)

聖若瑟修道院教堂位於緊靠聖老楞佐教堂的北邊，大門開在三巴仔街 (Rua de Seminário) 上，面朝東南方。《澳門記略》說：“澳西有小三巴寺，規制差約而軒豁過之，三巴之外庫也。”⁽⁶²⁾ 因為與大三巴同為耶穌會所創建作為培養東方傳教士的學院，而且又建於大三巴之後，故華人多稱之為“三巴仔”。

這座外形像希臘式十字架、傾向於巴羅克風格的教堂在東方極為罕見，同樣風格的祇有舊果阿城的聖康塔諾 (S. Caetano) 教堂。

教堂矗立在一排寬大的大理石石階上，進口的大門不大，但很精緻。出口的結構類似於聖保祿教堂，後者也是一座耶穌會教堂，同樣矗立在一排大理石石階上。教堂位置顯著，正面面壁的結構也很獨特，儘管1953年在澳門主教唐·若奧·得烏斯·拉馬略 (D. João de Deus Ramalho) 的命令下，教堂外層材料有了些變化。

教堂的建造工程於1746年開工，安放下了第一塊石頭，1758年建成，附屬於修道院。聖若瑟教堂大門的右邊，有一塊石頭，用拉丁文鐫刻以下文字：“本教堂獻給聖約瑟，它的第一塊石頭於公元1746年由耶穌會士放置，教堂建成於1758年。”⁽⁶³⁾

1759年，龐巴爾侯爵 (Marquis Pombal) 解散了葡萄牙的耶穌會。1762年，澳門的耶穌會教士也被逮捕，並於1767年被驅逐出了澳門，此事對澳門和中國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⁶⁴⁾

面對這種情況，1783年後，遣使會教士取代耶穌會教士，成為北京的主要傳教士。1797年的一封皇家信函肯定了這種情況，並把北京的聖約瑟教堂授予了遣使會教士。也是在同一年，舊聖若瑟學院變成了一座修道院。⁽⁶⁵⁾

由於教堂穹頂和支撐拱門朽壞得很厲害，需要馬上加固，1995年，教堂不得不向遊人關閉。穹頂馬上就被支撐住了，修復和加固工程也馬上開工。工程於1999年年初開工，工程包括用一個雖然較輕

但與其相似的穹頂代替原來的穹頂，加固基礎，內部木器和粉飾進行修理，內部電器和照明用具更新，祭壇重建，塑像重新佈置，把它們放置到恰當的位置，把所謂的“水刷石” (Shanghai-plaster) 恢復成原來的灰泥飾面，該工程在1999年內完成。

二、廟宇建築

1) 媽閣廟

媽閣廟位於澳門半島西端，依山而建，背山面海，是一座富有中國民族特色的古建築。媽閣廟主要由入口大門、牌坊、正殿、弘仁殿、觀音殿及正覺禪林組成，各建築規模雖然細小簡陋，但卻能充份融合自然，佈局錯落有致。

媽閣廟包括“神山第一”殿、正覺禪林、弘仁殿、觀音閣等建築物。明朝時本名“天妃廟 (宮)”，至清道光八年 (1828) 重修時增建山門，額名“媽祖閣”，華人俗稱“媽祖廟”，又有另稱“正覺禪林”。

媽閣廟之建築物建於不同時期，整座媽閣廟至清道光八年 (1828) 才初具規模。現在廟內有實物可考，而歷史最長的是“神山第一”殿。該殿供奉天后，由當時官方與商戶合資籌建於明萬曆三十三年 (1605)⁽⁶⁶⁾，至明崇禎二年 (1629) 重修，其門口石橫樑至今仍存初建時的石刻。媽閣廟之“神山第一”殿因而是澳門現存廟宇中有明確實物可考的最古老的廟宇，也是澳門文物中原建築保存至今時間最長的。

弘仁殿相傳建於明弘治元年 (1488)，現存門楣石刻“弘仁殿”三字，旁邊之題款則為清道光八年 (1828)。該殿是一座小型石殿，供奉天后。

觀音閣的建築年代無從稽考，閣內現存一塊清道光八年 (1828) 重修の木匾，則觀音閣應建於此前，閣內供奉觀音。⁽⁶⁷⁾

正覺禪林也是建於清道光八年 (1828)，供奉天后。此殿在1988年2月8日曾發生火災，後由前文化司署按原貌重修，至翌年2月完成。

1874年、1875年，媽閣廟先後兩次遭受火災，造成損毀，於是由居民集資，於清光緒元年 (1875) 開始重修，至清光緒十三年 (1887) 落

成，形成今天的樣子。

除了於1983年及1988年給予資助維修該廟外，前文化司署於1996-1997年間對該廟進行保養工程，包括牆壁、裝飾牆身及門窗的框架等。

2) 普濟禪院

普濟禪院位於美副將大馬路，是澳門三大古刹之一，也是澳門地區最大的一間寺廟。其前身本名觀音堂，由望廈村村民所建，因供奉觀音菩薩而名，至今華人仍稱之為“觀音堂”。現存鐵鐘銘文記：“鐘壹口重四百餘斤，奉於觀音堂永遠供奉，祈求諸事勝意。崇禎五年正月吉日立。”從實物考證分析，觀音堂應建於明崇禎五年（1632）。普濟禪院創建的時間應在1689-1692年間，由大汕和尚的長壽寺派人及出資，而具體是由其徒孫循智創建和兼併原觀音堂而發展起來的民間禪院。⁽⁶⁸⁾

普濟禪院創建以後，至清嘉慶二十三年（1818）由澳門商人和望廈村民集資重修。到了咸豐年間，住持暢瀾和尚發起募捐，於咸豐八年（1858）大肆重修和擴建，奠定了今天的規模。後來於同治五年（1866）孟蘭建醮期間竹棚失火，波及大雄寶殿，遂於同治七年（1868）重修，恢復舊貌。⁽⁶⁹⁾

普濟禪院中軸部分由頭座大雄寶殿，二進長壽佛殿和後座觀音殿組成。西廳之首座為天后殿，次座為地藏殿，後座有語清堂、龍華堂、靜樂堂等，正中有祖師堂供奉袞開山老祖大汕法師。東廳有“退一步齋”，首座為關帝殿，次座為大客堂，後座為檀越堂。再往左邊，有頌恩堂，妙香堂，齋堂，方丈廳，藏經樓等。⁽⁷⁰⁾其後有後山花園，1844年7月3日中美第一個條約〈望廈條約〉就在後花園的石桌上簽字。⁽⁷¹⁾

除極具歷史和藝術價值的建築和雕塑外，普濟禪院還藏有不少珍貴經卷，以及名家留下的字畫，都是澳門重要的文物。中國畫嶺南派大師高劍父在抗日戰爭時期曾經寓居於禪院內作畫授徒。

3) 蓮峰廟

蓮峰廟位於提督馬路，也是澳門三大古刹之一。據《澳門記略》內的〈正面澳門圖〉標示為新

廟，因此並不可能是澳門民間傳說所指該廟建於明朝。另據廟內碑文記載，該廟鼎建於清雍正元年（1723），名慈護宮，又名關開廟、娘媽新廟。其後歷經多次重修及擴建，始成今日規模。該廟於嘉慶六年（1801）重修時已有蓮峰廟之稱，後於清光緒二年（1876）重修時，正式刻成匾額定名為蓮峰廟，這應該與它背靠蓮峰山有關。

此廟由當時中國官、商共建，一方面供官方祭祀，另一方面作赴澳公幹的官員客居之所，同時也是當年華人商賈的議事廳。

蓮峰廟中央有前廳，中庭有亭臺一座，為舊日中國官吏來澳審案之所。接舐是天后殿。再入是觀音殿。廟左前為武帝殿，中為客廳，後有供祀先賢祿位處。廟右前為仁壽殿，中為倉頡及沮誦殿，後為金花及痘母殿。⁽⁷²⁾

著名的禁煙欽差大臣林則徐及兩廣總督鄧廷楨於清道光十九年（1839）巡視澳門時，即以蓮峰廟為接見葡萄牙官員的地方。1989年，為紀念林則徐來澳150週年，在廟外立有林則徐雕像。現在該廟旁廣場還建有“林則徐紀念館”。

4) 其它廟宇

澳門的其它廟宇還有：沙梨頭土地廟、觀音古廟、康公廟、包公廟、蓮溪新廟、魯班師傅廟、馬交石天后廟、關帝廟、哪吒廟（柿山）、下環福德祠、石敢當行臺、先峰廟。這些廟宇大部分都是建於1800年至1900年期間，見證舐中葡兩國對澳門有效管治的轉變。

三、炮臺建築

1) 大炮臺

大炮臺又稱三巴炮臺、中央炮臺、聖保祿炮臺，位於海拔52米的大炮臺山頂。大炮臺的位置原來是聖保祿學院的祀天祭臺，明萬曆四十五年（1617）起由耶穌會會士改建為炮臺，明天啟六年（1626）建成⁽⁷³⁾，名為聖保祿炮臺，澳門居民多稱其為“大炮臺”。

這座炮臺是當時澳門防禦系統的核心，構成一個覆蓋東西海岸的寬大炮火防衛網；設置多門大炮，並備有水池及軍需庫；當年的軍需庫儲備充

足，即使遭受長達兩年的包圍，也足以應付。大炮臺佔地面積10,000平方米，呈正方形，圍有堅厚石牆，形似歐洲古堡。城牆用夯土（一種泥土、草和牡蠣殼粉三者混合的材料）壘建。

2) 聖地亞哥炮臺

聖地亞哥炮臺，又稱西灣炮臺、媽閣炮臺，位於澳門半島南端靠媽閣山的海邊。炮臺於明崇禎二年（1629）建成，由於地處內港狹窄入口處，可以控制所有海上活動，是當時澳門的一座重要的炮臺。⁽⁷⁴⁾ 舊炮臺留下的城牆現還有大約110米長，9米高，底部有5.9米寬，頂部有3.4米寬。城牆是用夯土（chunambo）造的，混進一些石塊，但比大炮臺的質量要差一些。

3) 燒灰爐炮臺

燒灰爐炮臺又稱聖母炮臺，位於西望洋山東南麓的南灣地段，負責防禦從外港來的攻擊。據記載，炮臺在明天啟二年（1622）擊退荷蘭人入侵時即已存在⁽⁷⁵⁾，也是用夯土建造的，建在聖奧斯定會早年會所原址，即今葡萄牙駐澳門總領事官邸（前峰景酒店）東邊。

4) 東望洋炮臺

東望洋炮臺位於澳門半島最高點94米的東望洋山頂，1848年前是唯一一座在城牆以外的炮臺。東望洋炮臺於明崇禎十一年（1638）建成；炮臺內的燈塔則創建於清同治三年（1864），次年9月24日正式啟用，是中國以至遠東地區最古老的燈塔。東望洋燈塔是澳門著名的城市標誌，也是澳門的地標：燈塔所處的經緯度（東經113°35′，北緯21°11′）即為澳門的地理座標。

5) 聖方濟各堡壘

聖方濟各堡壘又稱嘉思欄炮臺，位於南灣大馬路之始點，是防禦外來攻擊的第一道防線。該炮臺因鄰近舊聖方濟各修院，因此稱為聖方濟各炮臺，其雛型大約建於1623年⁽⁷⁶⁾，其炮火射程最遠能達由仔島雞頸山的盡頭，是當時澳門東南方向海防重地。炮臺石牆高逾2丈，寬20餘丈，原呈橢圓形；分上下兩層，有隧道可通往下層。現下層炮壘，已被填海工程湮沒。炮臺後的兩層樓房即為嘉思欄兵

營。

6) 其它炮臺

澳門半島的炮臺還有：清同治五年（1866）建成的望廈炮臺、清咸豐二年（1852）建成的馬交石炮臺。這都是1848年葡萄牙實行在澳門的殖民管治，拆毀原天主教城的城牆，佔領城外華人村落至現關閘後建造的，目的是為了防禦從大陸來的攻擊。

四、民居建築

澳門的社會有西方人定居和華人移居的特殊環境。早期的建築無論是華人還是葡人的房子都較簡陋，基本上按照家鄉的建築形式和建造方法。隨着建造行業的興旺，建屋的工匠隊伍有一定的規模，建造的技術混合了傳統的中式尺量法和西化造型的手法，材料的使用，有華人喜好的磚木、陶瓷，也有葡人常用的石條、土坯、金屬構件等。一般華人的住宅在室內依然保持傳統的平面佈局和裝飾，室外門窗、入口、陽臺等則多採用西方的建築手法，建築風格上別具特色。

澳門民居的類型因所在區域的性質、戶主和年份的不同，大致有以下幾種類別：

1) 大型中式民居

華人的大宅現存數量不多，建築平面佈局與廣東地區的城填或村落相似。民居一般是多層樓房，平面三開間，其中有三間兩廊式，四合院式或是組合式，屋內有天井，屋旁有庭院或花園。目前最大的民居建築群是鄭家大屋，其它保存較好民居有大堂街7號宅和水坑尾29號高宅、園林式建築組群的盧廉若花園大宅。

2) 小型中式民居

受到政局影響，20世紀20-30年代大量的人口從內地遷移入澳。澳門的人口數量急遽上升，由20年代前的70,000-80,000增至1940年的400,000人，導致澳門的土地價值頓時提高，居住的密度和居住單元的需求量大幅增加，民居一般為兩層半或以上，平面佈局多為竹筒式。

竹筒式住宅因地形和用途分成幾種類別，其中有：

— 單棟式住宅帶西式立面；
— 並聯式住宅帶中式或西式立面；
— 集居式住宅如聯排式住宅帶西式或中式立面，分佈在里巷間；

— 其它類型民宅，有些受西方建築學影響，根據功能需求而靈活佈局，平面緊湊，一宅多單元。

竹筒式住宅雖然面積小，室內空間簡單，但是建築外裝飾豐富美觀，相信與當年建造工匠的工藝水平和一般民眾的審美標準有關。

三、一般商住民居

典型的商住建築分佈在華人集居的內港灣岸上，建築類型是聯排式竹筒型鋪屋。沿大街首層鋪位外有騎樓，樓上住房有單開間或打通隔牆使用兩開間，佈置靈活，符合商品房要求，實用性強。⁽⁷⁷⁾

從澳門城市建築看中西文化交融

一、天主教城的形成與發展

嘉靖三十三年（1554），葡萄牙日本船隊指揮官索薩（Leonel de Sousa）與廣東海道副使汪柏達成口頭協議後，廣東地方官員允許葡萄牙人進入廣州進行合法的定期的貿易，為後來葡萄牙人在澳門建立居留地提供了基礎。據鄭舜功《日本一覽·窮河話海》卷六〈海市〉記載：“歲甲寅（1554），佛郎機夷船來泊廣東海上，比有周鸞號稱客綱，乃與番夷冒他國名，誑報海道，照例抽分，副使汪柏故許通市。而周鸞每以小舟誘引番夷，同裝番貨，市於廣東城下，亦嘗入城貿易。”說明所謂的“協議”並沒有涉及開放澳門作為葡萄牙人的居留地。至於澳門的建立，王士性記載當時情況較清楚：“其（夷商）初上舟居，以貨久不脫，稍有一二登陸而拓架者，諸番遂漸徼之。”⁽⁷⁸⁾由於需要保持與廣東當局的定期貿易，葡萄牙人必須在廣州港的外海有一個臨時的居留地，初則在浪白澳，後因當地風高浪惡，因此逐漸地遷移至澳門。1557年前聚居在浪白澳的葡萄牙人，逐漸移居澳門，當年的人口已達400名天主教徒。⁽⁷⁹⁾當然，從一開始，澳門居民的構成不僅有葡萄牙人，而且主要是從世界各地

跟隨妹葡萄牙人遠洋航行而來的印度人、非洲人、暹羅人、馬來人和日本人等。

澳門城剛開始的時候祇是一個臨時的居留地，或者說是基於以貿易為主導的一個商業點，並不具備一個城市的雛型。大部分的臨時建築都分佈在海邊和山坡上。最早的建築都是用簡單的材料，如木板和稻草建造，因此現在已經很難找到這些建築的痕跡。隨妹從事日本與中國之間貿易的不斷發展，澳門與廣州之間的商業往來越來越頻繁，當然也包括與中國海上商人的貿易活動。龐大的商業利潤使澳門逐漸發展成在廣州以外的重要商業港口。在這個居留地上的外國商人開始從中國商人的手裡購進木材、磚瓦等耐用的建築材料來建造固定的建築物，這引起了中國方面的疑慮。這正如《澳門記略》所言：“初僅芟舍，商人牟奸利者漸運瓦甍檁桷為屋，佛郎機遂得混入，高棟飛甍，櫛比相望，久之遂專為所據。”⁽⁸⁰⁾開始的時候，大家都在各自看中的地方建造自己的倉庫和房屋，當時還沒有任何官方的機構去管理土地，當然也沒有土地的買賣。

隨妹大量的天主教徒聚居在澳門，為了向他們提供宗教服務的需要，在1560年之前，在澳門半島已經建立了三座簡陋的教堂：聖安多尼教堂、聖老楞佐教堂和聖母望德教堂。這些教堂都隸屬於印度果亞教區，並沒有肩負傳教的功能。由於大部分的教堂都是建在地勢較高的地方，因此開始了澳門有規劃的城市佈局。教堂前地有助於居民點的佈局，葡萄牙人墨守成規這一傳統特點也表現在自發地進行城市建設方面，他們在澳門重新採用了在印度和其它亞洲商站相同的做法。

第一批耶穌會傳教士抵達並定居澳門是在1563年7月29日，在此之前的1561年，耶穌會傳教士曾赴日本傳教途經澳門。為了向遠赴日本傳教的傳教士提供服務，為了使在澳門等待中國官方的批准而進入中國傳教的傳教士有寓居之所，澳門很快就建立起一個小禮拜堂和寓所。

隨妹耶穌會活動的發展，在1575至1579年間建立一個更大的教堂和寓所。1580年范禮安神父在寓

所後建立了一個學習中心，專門安排傳教士學習中國文化和語言（後來的利瑪竇神父在進入中國傳教前就是在這中心學習）。（⁸¹）1576年1月23日通過〈super Specula Militantis Ecclesiae〉敕書，教皇格雷戈利奧十三世（Gregório XIII）成立澳門教區，其轄理包括中國、日本、朝鮮和所有毗鄰島嶼，並即任命唐·貝爾希奧·賈尼路(D. Belchior Carneiro)為署理主教。（⁸²）1594年耶穌會學院成立，課程包括閱讀與書寫、文法、人文學、倫理神學，後期還有藝術和中國文化、拉丁文、數學、音樂等。學生有當地的居民和來自日本和果亞的耶穌會會員。（⁸³）耶穌會學院即聖保祿學院是澳門第一個教育機構，為天主教在東方的傳播提供堅實的基礎。該學院一直發展至相當於大學的水平，並擁有一藏書豐富的圖書館和印刷廠，直至1835年大火燒燬為止，它一直是東南亞地區一個重要的學院。

1580年至1620年西班牙兼並葡萄牙期間，更多其它的傳教會陸續到達澳門，包括聖奧斯定修會、聖多明尼修會、聖方濟各修會等，他們都在澳門建立起教堂和修道院，使澳門逐漸發展成一個重要的天主教傳教基地，被譽為“東方的梵蒂岡”。

隨着教堂數量的增加，和居住人口的增長，在教堂周圍建立的居民點越來越大。1574年明朝政府在連接澳門半島的狹長地峽（稱為蓮莖）上建立了關閘樓，目的是為了更好控制葡人和其它外國人在澳門半島南部的活動，同時也限制內地居民和商人進出澳門。在盧坤《廣東海防匯覽》卷三十七〈方略〉中記載：“明萬曆二年設關閘，委官守之，每逢一、六開關，歲放米若干石，每月六啟閉。廣肇南韶道發封條六道，文武官會同驗放，事已閉關，復就其聚廬大街中貫四維，各樹高柵，榜以畏威懷德，分左右，定其門籍。”（⁸⁴）可見，明政府在設立關閘樓的同時，也在澳門的中心劃定街道和門籍，以方便對在澳夷商的管理，因此可以證明這一條“中貫四維”的十字大街是建於明萬曆二年（1574）。

到了16世紀80年代，由於意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的努力，開始了天主教在中國內

地的傳教事業。利瑪竇先後在中國內地的肇慶、韶州、南雄、南昌、南京和北京設立教堂，吸收大批中國教徒入教，而他的全部傳教工作都是以澳門為基地進行的。利瑪竇於1582年到達澳門，寓居在天主聖母堂寓舍，在聖保祿學院前身的學習中心學習中文，研究適合中國的傳教方法，作為在中國內地傳教的種種準備工作。由於澳門教區直接管轄中國的傳教工作，加上在澳門的各個傳教會的目的都是為了進入中國內地傳教，因此，澳門成為天主教在中國傳教活動的後勤基地，當傳教活動遇到挫折的時候，澳門又成為這些傳教士的庇護所。

隨着天主教在中國內地的傳播和發展，到了清朝初年，楊光先在〈請誅邪教狀〉中說，有三十所大教堂遍佈於全國大中城市，全國天主教徒達十五萬人左右。（⁸⁵）但是作為傳教基地的澳門祇有不足七千名華人天主教徒（⁸⁶），而且祇有一個教堂為華人教徒服務，就是由聖保祿教堂教士負責管理並用漢語傳教的“唐人廟”。乾隆十年（1746），澳門同知張汝霖詳細報告了中國人在澳門唐人廟入教的情況：“其唐人進教者約有二種：一係在澳進教；二係各縣每年一次赴澳進教。其在澳進教者，久居澳地，集染已深，語言習尚漸化為夷。……其各縣每年一次赴澳進教者，緣澳門三巴寺下建有天主堂，名進教寺，專為唐人進教之所，建於康熙十八年。五十八年重修闊大，係蕃僧倡首，而唐人醵金以建者。”（⁸⁷）

由此可見，在澳的天主教區為了表示對地方官員的恭順，特別設一唐人廟為華人教徒服務，其它教堂祇向葡萄牙人和其它外國人教徒服務。另一方面，當中國當局禁止華人進教時，此舉也可以避免殃及其它教堂。

葡萄牙人在亞洲擴張和建立居留地的第一件事是建立炮臺和其它防禦設施，目的是為了保護其商船和居留地免受敵人的攻擊。但是直至1600年以前，澳門還沒有一個固定的炮臺，雖然澳門已經從一個臨時的居留地逐漸轉變成固定的居留地，居留地的防衛主要由船隊的火炮、簡陋的岸邊堡壘和一些安置在戰略要點的火炮來負責。隨着貿易所帶來

的鉅額利潤，葡萄牙人為了保護這個居留地的財富、防禦來自海盜的搶掠和新崛起的其它西方列強的威脅，開始在澳門半島建造炮臺，在南灣的北端建立了聖方濟各炮臺、南端有燒灰爐炮臺和澳門半島最高點建立的東望洋炮臺，負責防禦來自外海的攻擊；在半島最南端的有聖地亞哥炮臺，作為扼守內港入口的最具戰略性的防禦設施；和位於市中心的山丘上建立的大炮臺，組成了這個城市最堅固的防禦系統。同時葡萄牙人也嚐試建造城牆，劃定他們的保護範圍。

葡萄牙在建造炮臺和城牆的過程中，一直都受到中國當局的反對而遭拆毀。在1604年由於受到來自荷蘭船隊的威脅，荷蘭人對澳門的一系列襲擊在1604、1607、1622和1627年多次發生以後，中國地方當局默許了葡萄牙人建造炮臺和城牆的要求。1623年5月6日印度總督以葡萄牙國王的名義下令，任命王室貴族唐·馬士加路也（D. Francisco de Mascarenhas）為澳門第一任總督兼兵頭⁽⁸⁸⁾。他到達澳門後，就開始築城牆。但是中國官方祇允許建築面海及向西的城牆，以防備其它夷人的進犯；面對大陸的部分是不准築城的，已造好的也得拆除。隨姚明皇朝的衰落，明政府曾要求在澳葡人組成火炮隊協助抵抗滿洲人的入侵，造成了葡人以修築炮臺和城牆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因此，從1622年至1648年間在澳葡人修建了堅固的炮臺和城牆，從而在地理上也劃定了葡萄牙人天主教城的範圍。另一方面，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葡人興建的城牆和官方在蓮莖上設置的關閘樓，使中國地方當局可以更有效地孤立和管治城裡的外國居民，防止他們進入中國內地。

天主教城內公共建築的興建還是由教會來主導，1576年被任命為第一任澳門主教的唐·卡內羅（D. Belchior Carneiro）於1568年到達澳門後，就創辦了澳門第一個慈善機構——仁慈堂和窮人醫院——聖拉匝祿醫院（S. Rafael Hospital）。澳門仁慈堂是面向窮人和病人的慈善機構，主要服務於澳門的葡籍社區，這也說明了一個事實，今天老區的很多物業都屬於他們。

在澳門這個主要從事海上貿易的城市，成年男子經常是每年有六至八個月在海上，容易遇到海難和海盜，因此常常有被丟下的孤兒寡母窮困潦倒，祇有靠仁慈堂收容照顧他們。這個慈善機構在澳門居民中享有極高的威望，它通過募捐和遺產捐贈等方式籌集資金以照顧城裡的居民。

1586年澳門取得了城市的地位，成為中國澳門上帝聖名之城，由1583年成立的市議會負責市政方面的管理工作。另一方面，市議會也負責與中國地方當局在民事、商務和管治的協調工作。

踏入17世紀，天主教城得到很大的發展，大部分教堂得以新建或重建。新建的教堂和修道院包括西班牙修女們興建的聖嘉辣修道院和為華人新教徒修建的安帕羅聖母教堂等。重建的有聖保祿教堂、聖安多尼教堂、聖老楞佐教堂等。但在1641年荷蘭人佔領了馬六甲，中斷了澳門—馬六甲—果亞的貿易航線，同時日本方面也驅逐葡萄牙商人，使澳門急速地走向衰退。澳門的葡萄牙人不得不轉向帝汶的小巽他群島、蘇祿、蘇拉威西的望加錫、印度支那和暹羅等地，在那裡開闢新市場，以求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失去日本貿易的損失。眾多市場的開闢，使葡萄牙人得以擺脫困境，繼續維持在澳門的商業地位。⁽⁸⁹⁾與此同時，其它富裕的歐洲天主教徒也開始進入澳門並成為當地的居民。

18世紀隨姚廣州港向外商重開，和每年一次的定期交易，澳門作為中國唯一的外貿港口的優勢中斷，澳門的經濟結構產生了重大的變化。廣州交易會期間，外國的貿易公司都在沙面設立貨倉和洋行。由於清政府規定外商及其家屬都不能在廣州居留，故澳門就成為眾多歐洲公司和美洲公司設立總部的城市，也就是成為他們進入廣州貿易的中轉站。在城市建築方面，很多源自歐洲的建築風格就在這個時候被引入澳門，這主要表現在南灣一帶的商行、住宅和政府建築上。在宗教建築方面，1746年奠基、1758年完成的聖若瑟修道院教堂，典型的巴洛克風格在這教堂的建築上得到充份的表現。

19世紀由於鴉片貿易的利潤，教會可以使用更耐用的材料重建和擴建一系列的教堂，包括聖老楞

佐教堂、聖奧斯定教堂和聖嘉辣教堂等。1828年當時在城內的天主教居民的人口主要分佈在大堂區2,130人、老楞佐堂區1,720人和安多尼堂區456人，另外城內的華人居民有8,000人和城外華人非天主教居民有22,000人。⁽⁹⁰⁾天主教和教堂仍然主導城市的日常生活，但是其它的歐洲商人主要是信奉基督教，他們也開始建設基督〔新〕教的宗教設施，包括禮拜和墓園等，同時也開展基督〔新〕教向中國內地傳教的工作。當然，澳門作為一個國際港口城市，其它宗教也有傳入，特別是拜火教，他們的墳墓至今仍然保存。隨鴉片戰爭的結束，香港的開埠，大部分的國際貿易商人轉移到香港。加之葡萄牙人拆毀城牆，擴充城市的範圍，佔領由仔和路環，開始澳門的殖民管治，使澳門的近代城市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二、華人居住區的形成與發展

澳門原隸屬於香山縣，是香山大島伸入大海的一個半島的頂端，歷來與香山島的發展息息相關。澳門的城市成長於明代。在明朝以前，澳門這個地方十分荒涼，這與澳門所在的香山縣開發較晚有關。而且在葡萄牙人到達澳門以前，在地方志上都沒有有關村落或任何形式的行政單位的記載。自宋以後，大量的福建人移居香山縣，並逐漸成為香山縣的主體居民之一。⁽⁹¹⁾

澳門作為一個港口城市，其發展在明代。自葡萄牙人居留開發後，進入了最繁榮的時期，使當時的澳門成為東方最富庶的商業港口。但是，作為一個泊口其始創的時期應在葡萄牙人到達之前。明中葉的澳門尚是一個荒涼的泊口，祇有一些東南亞諸國的商人來中國進行朝貢貿易的同時，在廣州港外海如澳門等島嶼與華人進行違禁的私人貿易，漸漸地發展成為一個非固定的聚落。

葡萄牙人到達中國沿海之前，已經在馬六甲與中國商人打交道並進行貿易，佔領馬六甲以後，在中國領航員的協助下，於1517年8月15日他們由八艘船組成的使節團安全地駛抵屯門島。⁽⁹²⁾當與中國官方建立定期貿易的嘗試失敗後，葡萄牙人開始在福建海寇商人的招引下在浙江和福建沿海進行走私活

動。⁽⁹³⁾因此，從一開始葡人與中國商人接觸，福建海寇商人就與他們形成相互依存的關係。自朱紉自殺，海禁鬆弛後，葡萄牙人最終來到澳門，並逐漸成為澳門的實際控制者。當然，隨族葡人入居澳門，一部分福建商人也因貿易的需要逐漸定居澳門，形成了華人的居住區。而且早期華人居民都是從海路來的商人和船員，因為從陸路來自香山縣其它地方的居民，祇可以白天進城做小買賣或工作，晚上必須回原地居住，並受到香山縣官員的嚴格限制。因此，第一個華人居住區的居民大部分是福建人，隨之媽祖信仰也傳入了澳門。

明代郭尚賓在萬曆四十一年（1613）的奏疏中說道：“乃閩廣亡命之徒，因之為利，遂乘以肆奸，有見夷人之糧米牲菜等物，盡仰於廣州，則不特官澳運濟，而私澳之販米於夷者更多焉。有見廣州之刀環、硝磺、銃彈等物，盡中於夷用，則不特私買往販而投入，為夷人製造者更多焉。有拐掠城市之男婦人口，賣夷以取貲，每歲不知其數，而藏身於澳夷之市，劃策於夷人之幕者更多焉。”⁽⁹⁴⁾從上述所言可以說明三點：1）福建和廣東的逐利之徒不斷地移入澳門；2）至萬曆年間澳門還沒有一個農業村落存在，因為一切糧米牲菜等物皆由廣州供給；3）葡人到達之前，澳門不是一個漁村，因為這裡沒有農產品供應或與漁民互市的條件。

後來，隨族澳門城人口的增加，為了供應其市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在澳門城市的外國商人與華人之間的商業活動也漸趨繁榮，並已有集市的形式出現，即在現營地大街的位置。自1570年起，越來越多華人轉奉天主教，同時大量的日本天主教徒來澳居住和在耶穌會修院內學習，澳門城的居民組成更為複雜。明嘉靖年間的名臣廣東人龐尚鵬稱：澳門“其通事多漳、泉、寧、紹及東莞、新會人為之，椎髻環耳，倣番衣服聲音。”⁽⁹⁵⁾

居民區的成片出現導致了街道的形成。澳門最早的街道是一條“中貫四維”的十字大街。郭棻《廣東通志》卷六九載：“陳督撫又奏，將共聚廬中有大街中貫四維，各樹高棚，榜以‘畏、威、懷、德’四字，分左右定其門籍。以‘明王慎德，

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服食器用’二十字分東西為號，東十號，西十號，使互相維繫譏察，毋得容奸，諸夷亦唯唯聽命。”⁽⁹⁶⁾這條街道的設立，本來是明朝政府為了管理在澳門的外國居民而設的，但是由於華人進入澳門者與日俱增，到了萬曆三十三年（1605）時，其中“德”字街已為華人入居，至崇禎二年（1629）時，華商則進一步發展至“懷”、“德”二街。有澳門媽閣廟的神山第一亭正面石橫樑上所刻為證：

明萬曆乙巳年德字街眾商建
崇禎己巳年懷德二街重修⁽⁹⁷⁾

雖然在城內的華人居住區和外國人居住區相應地發展，華人居住區主要集中在內港一帶，人口也增加到4,000人⁽⁹⁸⁾，但是當時的澳門城外仍然是荒蕪之地。隨明朝衰落，明清兩朝更替之間，大量的內地難民來到澳門（主要是來自廣東內地的難民），人口迅速增至四萬人。⁽⁹⁹⁾於是天主教城外的荒地得到開墾，隨之建立了以農業為經濟的華人村落，如望廈村和龍田村。到了17世紀末，澳門人口達到19,500人。⁽¹⁰⁰⁾有關城外華人居住區的發展，從在1689年至1692年間創建的普濟禪院和設於望廈村的縣丞新署的建築可反映出來。另外，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宣佈開海禁之後不久，清政府就在澳門設海關監督行臺，其位置在今澳門關前正街，同時建立的稅館也在附近。⁽¹⁰¹⁾同時，沙梨頭村也慢慢形成。建於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的沙梨頭土地廟，初時僅有一石刻祭壇，後來經過多次重修擴大，才奠定今日的規模，廟內的碑刻可以說明沙梨頭村的發展。

1723年建成的蓮峰廟是一座官商合建的廟宇，顯示了中國地方當局對城外華人村落的管治。從這三大古廟都同時主要供奉天后和觀音兩個神祇來看，澳門的華人人口主要是來自福建和廣東的移民。

1730年雍正皇帝降旨，准許蠻民在岸上建造房屋，結束了蠻民不能上岸居住的陋習。於是在內港

沿岸出現了新的居民點，開始是簡單的棚屋，後來才改為類似當地住戶的住宅。⁽¹⁰²⁾1749年中國官員規定在澳夷人不經允許，不能建新的房屋。⁽¹⁰³⁾但是，華人居民不受限制，而且在18世紀後期，官、商合建了沙梨頭土地廟和關帝古廟。關帝古廟也是“三街會館”所在地，是澳門最早的華人救濟機構。

直至1848年，在天主教城內的華人居住區主要分佈在爐石塘至沙梨頭一帶，華人天主教徒主要集中在望德堂，而且他們與土生葡人社區已經很難清楚劃分。城外的有媽閣村、龍田村、望廈村和新橋。1848年以後，隨城區的發展，華人居住區的發展也可以從後期創建的民間廟宇反映出來。

三、從城市建築看中西文化交融

明清是中國封建社會、封建文化發展的最後階段。它在建築文化史上，可以說是充滿了衝突、曲折、融合與痛苦的時代，也是百川歸海的時代，它標誌著中國舊建築的終結與新建築的開始，這種劇烈的變動，也許就是一種頗為複雜、豐富的文化現象。而中國建築文化所走過的歷程，除了政治變動對其施以重大影響之外，社會經濟嬗變的巨大制約力也是不可低估的。加上其它文化因素，諸如社會意識、觀念及時代思想和學術的轉變等等，也會直接間接或多或少地在建築文化上打上烙印。⁽¹⁰⁴⁾尤其是澳門，中西文化的交融在城市空間、街區和單幢的建築物上都得到充份的反映。

以媽閣廟、港務局大樓、鄭家大屋（鄭觀應故居）、峰景酒店大樓及燒灰爐炮臺、聖老楞佐教堂、聖若瑟修院大樓及聖堂、聖奧斯定教堂、崗頂劇院（伯多祿五世劇院）、市政廳大樓（臨時澳門市政局大樓）、仁慈堂大樓、玫瑰堂、大三巴牌版（聖保祿教堂遺址）、哪吒廟、舊城牆遺址、大炮臺、基督教墳場、東望洋炮臺（包括聖母雪地殿教堂及燈塔）等組成的澳門歷史建築群，是中國境內現存最古老、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也是最集中的以西式建築為主、中西結合最具特色的歷史建築群，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中國傳教的歷史見證，更是四百多年來中西文化互相交流、多元共存的傑出

例子。

作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樞紐，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中國以至遠東最重要的傳教基地，16-18世紀中西貿易重要的國際港口，澳門得天獨厚，沒有經歷重大戰爭，遺留下許多寶貴的文化遺產；澳門歷史建築群是其中最具特色的一組。這些建築物，以其歷史悠久、中西並存、豐富多樣等特色而卓然屹立於世。

澳門歷史建築群最早創建於四百多年前，形式多樣，有中式的廟宇、大宅，有西式的教堂、大樓、劇院、炮臺、墓園。它們顯示了中國民間信仰在特殊歷史環境下的延續與變異，和以葡萄牙人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中國的融合與演變，是西式宗教建築、軍事設施在中國境內最古老和完整的遺蹟。它們見證了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的碰撞與對話，證明了中國傳統文化永不衰敗的生命力及其開放性和包容性，以及中西兩種異質文化和平共存的可能性。

最重要的是，這些澳門歷史建築到今天依然延續原有的功能，成為澳門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同時，它們也是澳門的象徵，以其獨特的豐姿吸引世界各地遊客前來澳門。

澳門是中國境內現存西式建築最古老、最集中的地方，反映了16世紀以來中西文化交流的成果。

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文化交流的黃金時代，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影響最大、最重要的一次是歐洲文化的傳入；其傳入時間為16世紀初，而最先到達的地點就是澳門。以葡萄牙商人為主的外國人在16世紀中葉入居澳門，澳門由此發展成為中國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也是遠東地區重要的國際港口。雖然明清兩朝曾實施過閉關鎖國政策，但直至鴉片戰爭前夕，兩百多年來澳門都是外國商人來華貿易的重要港口，甚至是唯一的港口。

貿易活動的興盛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前來。四百多年間，這裡除了中國人和葡萄牙人外，還有來自西班牙、英國、意大利、日本、瑞典、印度、朝鮮、東南亞地區、甚至非洲地區的人，澳門成為“華洋雜處”的國際城市。以葡萄牙人為主要的外國

人，帶有不同的思想文化，不同的職業技藝，不同的風俗習慣，在澳門城內蓋房子、建教堂、修馬路、築炮臺以至關建墓園，展現多姿多彩的生活，其中當然包括各類文化活動。在這種機遇下，澳門得風氣之先，成為中國境內接觸近代西方器物與文化最早、最多、最重要的地方，成為當時中國接解西方文化的橋頭堡。

隨着葡萄牙人的定居，他們把西式的建築傳統越洋帶到澳門，使澳門成為西洋建築傳入中國的濫觴。葡萄牙人在澳門建立的城市建築——房屋、教堂、炮臺等無一不顯出與西方建築的密切關係。事實上，文藝復興後的一些主要建築形式、風格，結合亞洲其它不同建築元素在澳門產生了新的變體，形成獨樹一幟的建築風格。另一方面，葡萄牙人為抵禦其它西方國家侵佔澳門，從17世紀開始便修建城牆、炮臺，並且在澳門鑄造銅炮，為中國引進了西式軍事設施與裝備。明、清兩朝政府便曾派人到澳門來購買銅炮，以及聘請澳門葡人前往內地教授鑄炮、發炮技術等，促進了中國近代軍事技術的發展。

明末清初，大量天主教傳教士隨葡萄牙人的定居澳門而來到中國，並且以澳門為傳教基地，十分活躍地從事遠東地區的傳教工作，開啟了天主教對中國大規模傳教的歷史階段。這些傳教士來自不同的修會和國家，其中以耶穌會傳教士對中西文化交流的影響最大。為了達到“選派懂得中國語言文字的傳教士進入中國傳教”的目的，大部分的入華耶穌會傳教士都在澳門的聖保祿學院接受培訓，學習華語。於是，澳門雲集了許多學識淵博的耶穌會學者，他們帶來了當時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及人文藝術，並為澳門創造了許多“第一”，如亞洲第一所西式大學、中國第一所西式醫院、中國第一所西式印刷廠、中國境內第一份外文報紙等等。聖保祿學院及其後的聖若瑟修院更為天主教在遠東和中國的傳教事業培養了大量人才，同時也培養了大批中國籍的傳教士，對中西文化的交流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19世紀初，基督教傳教士羅拔·馬禮遜來到澳

門，開啟了繼天主教之後西方宗教對中國傳教的另一高潮。馬禮遜以澳門為基地，積極學習中文，翻譯聖經，編印漢英 - 英漢辭典，更在澳門招收了第一位華人基督教徒蔡高。此後，有十多位基督教傳教士相繼來澳門傳教，當中更包括第一位華人牧師梁發。

可以說，澳門是天主教與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的基地與源頭，這在中國城市是獨一無二的。

但最重要的是，在四百多年的歷史裡，中國人與葡萄牙人合力營造了不同的生活社區。這些生活社區，除了展示澳門的中、西式建築藝術特色外，更展現了中葡兩國人民不同宗教、文化以至生活習俗的中西交融與互相尊重。這種中葡人民共同醞釀出來的溫情、淳樸、包容的社區氣息，是澳門最有特色、最有價值的地方，也是中國其它城市所沒有的，即使它們跟澳門一樣受過西方文化的影響。

因此，澳門是四百多年中西方人士共同營造的歷史城市，而最能代表其歷史價值的澳門歷史建築群就是澳門為中國文化以至世界文化留存的一份珍貴遺產。

澳門歷史建築群是東南亞地區僅存的歷史見證，也是保存最完整、最悠久的歷史建築群，與澳門同類型的近現代城市如香港和其它東南亞城市的大部分歷史建築由於受到不適當的現代化而被破壞乃至被湮沒了。

澳門歷史建築群大部分保存良好，現存基本都是歷史原物。這些建築物及建築群建於不同時期，19世紀末已大致定型。在日常對建築物的維修保護中，嚴格遵守“不損害其原有特徵”的原則，參照歷史文獻、圖片，以傳統技術與現代科學技術相結合的手段進行。在設計、材料、工藝、風格等方面盡力保持歷史的真實性。建築群方面則注重周圍環境的配合，盡量保持原有的氛圍。因此，總體來說這些澳門歷史建築群基本上保持了歷史的規模、原貌和風格。

四、中西文化交融的結果

1) 澳門歷史建築群以中國現存最古老的西式建築遺產為主，又保存有澳門地區特色的中

國傳統建築，是東西方建築藝術的綜合體現。

由於歷史的原因，澳門歷史建築群形成許多“中國之最”。如：聖老楞佐教堂、聖奧斯定教堂、玫瑰堂是中國最早的一批天主教堂建築，也是現存最古老的教堂建築。聖若瑟修院是現存中國最古老而保持完整的修道院。大三巴牌坊是中國最古老的教堂遺址。以大炮臺為代表，包括東望洋炮臺、燒灰爐炮臺在內的西式炮臺也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炮臺群。基督教墳場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新教墳場。崗頂劇院是中國第一座西式劇院。東望洋燈塔更是遠東地區第一座燈塔，至今還在使用之中。可以說，澳門歷史建築群是西式古老建築在中國最集中的展示。

此外，有人說澳門是“東西方建築藝術的博物館”，澳門歷史建築群應是最能體現這個美譽的代表了。在這片面積狹小的區域裡，媽閣廟代表了中國嶺南風格的廟宇，鄭家大屋則代表姚清末院落式風格的富商大宅。西式建築物方面，更包含了文藝復興以後大部分的歐洲建築形式：如聖若瑟修院聖堂、玫瑰堂的巴洛克式；峰景酒店大樓、聖老楞佐教堂、崗頂劇院、市政廳大樓、仁慈堂大樓的新古典主義風格等；而最獨特的地方是，澳門的西式建築在上述風格的基礎上又糅合了印度、日本以及中國沿海地區的建築特色，表現出結合亞洲當地元素而產生的變體，如港務局大樓、聖奧斯定教堂、大三巴牌坊等等，對中國近代建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從上述可以看到，作為具有四百多年中西文化交流歷史的澳門，保存了一批反映歐洲特別是葡萄牙建築特色以及中西合璧的建築物，也保存了極具澳門特色的中國傳統建築，是品類最全、建築質量與藝術水平較高的東方城市。

2) 澳門歷史建築群是天主教、基督新教在中國以至遠東地區發展的重要見證，並且反映了別樹一幟的地方性中國民間信仰和社會形態。

自從16世紀中葉天主教傳入中國以後，澳門一直是天主教傳教士進入中國大陸的基地，涉及到耶穌會、聖奧斯定會、聖多明我會等不同天主教修

會。今天的聖奧斯定教堂、玫瑰堂均為過去天主教修會會院的遺址。由大三巴牌坊和大炮臺共同構成的聖保祿修院遺址和聖若瑟修院見證了天主教中國傳教事業和中西文化交流的輝煌事蹟。聖老楞佐教堂、聖若瑟修院聖堂、聖奧斯定教堂以及玫瑰堂組成中國最古老並且至今仍然運作的天主教教堂群，有超過三百年的歷史。至於19世紀初傳入中國的基督新教，其第一位來華傳教士、英國人馬禮遜牧師除了以澳門為傳教基地外，其遺體還埋葬在澳門的基督新教墳場內，可見澳門與基督新教的淵源深厚。

澳門最原始的民間信仰是對海神的崇拜，媽閣廟的媽祖崇拜是最好例證，表現了澳門與中國閩粵沿海居民媽祖信仰一脈相承的關係。而且，因應環境和歷史的演變，澳門的媽閣廟在中國眾多的媽祖廟中顯得別具特色。首先，它是官商合建的宗教建築，不是單純的民間私建，跟其它地方的傳統不同。其次它雖是以天后信仰為主，廟內卻兼有觀音、土地、阿彌陀佛等等，更有一座佛教的“正覺禪林”，充份體現了澳門地區獨特的民間神廟與佛寺禪林融合與兼容的特點。

3) 澳門歷史建築群是中西文化多元共存的獨特反映，是中國歷史城市中極具特色的組合。

從澳門歷史建築群的分佈可以看出，這是一個集合多種不同思想信仰、生活習慣的居民生活空間。供奉中國海神的媽祖廟與西方海神的聖老楞佐教堂相隔不遠；葡萄牙人生活區的亞婆井旁有妖中國近代著名思想家鄭觀應的大宅；聖若瑟修院培養了大批中國籍修士；崗頂前地上有葡人“大會堂”之稱的崗頂劇院，也有華人富紳何東的舊居；議事亭前地至今還是澳門華洋市民歡慶集會的中心廣場；與美麗的玫瑰堂相鄰的是澳門華人最早的市集營地街市；與巍峨的大三巴牌坊並立的是精緻小巧的哪吒廟；東望洋炮臺的聖母雪地殿教堂則有妖結合西式內容中式圖案的壁畫。總之，中西兼融、相互尊重，正是澳門歷史建築群的特色。

再仔細分辨的話，在這些建築中，有天主教的耶穌會、聖奧斯定會、聖多明我會等不同修會的教堂；另有基督新教的墳場和教堂。而中國的媽閣廟

裡也有座觀音殿、土地神——在短短的距離裡“縮龍成寸”地容納妖不同文化，保存妖不同特色的紀念性建築，並且互相影響，互相滲透，相映成趣，這就是體現了澳門尊重多元文化之共存互補以適應當代世界潮流的最佳例證。

4) 澳門歷史建築群是中西生活區有序的組合。

澳門半島是個面積狹小的地方，卻容納妖不同的文化、宗教以至生活習俗。城市空間反映了城市居民的實際生活情況，作為一個中西文化並存的城市，澳門現存的一些城市空間，正體現了昔日中、葡以及其它國籍居民在同一塊土地上生活的回憶。

澳門歷史建築群包括媽閣廟前地、亞婆井前地、崗頂前地、議事亭前地、板樟堂前地、白鴿巢前地，構成一組完整的組合，東西兼備，連貫緊湊，錯落有致。當中，以議事亭前地，板樟堂前地、營地街市三位一體而形成的空間綜合體最為獨特，具有明顯的南歐中世紀城市中心空間的特徵，就是政治、商業、宗教三位一體，是整個城市的心臟地帶，其空間的南歐色彩為亞洲城市之獨一無二者。如果注意到高樓大廈已經湮沒了具有相同歷史與建築風格的許多其它東方城市，澳門所保存妖的人類歷史與文化的成果，就顯得非常珍貴了。

【註】

- (1) 轉引自龍炳頤《香港古今建築》，香港三聯書店，1992，頁1。
- (2) 崔世平、趙炳時：《21世紀澳門城市規劃綱要研究》，澳門發展與合作基金會，1999年，頁5。
- (3) 魏清源等：《世紀之交的珠江三角洲行政區劃》，廣東地圖出版社，頁6。
- (4)(5)(6) 李平白等：《珠江三角洲一萬年來環境演變》，海洋出版社，1991年，頁73。
- (7)(34)(57)(60)(62)(101) 印光任、張汝霖著，趙春農校：《澳門記略校注》，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頁26；頁150-151；頁150；頁150；頁150；頁25。
- (8) 楊士挺：〈略論澳門黑沙史前文化與珠江三角洲史前文化的密切關係〉，載於《澳門教育、歷史與文化論文集》，學術研究出版社，1995年。
- (9) “澳門地區”指澳門半島、古仔和路環的海陸區域。
- (10) 譚世寶：〈關於開埠前澳門半島上的“村”的傳說探真〉，載於《文化雜誌》中文版第26期，澳門文化司署，1996年。
- (11) 黃啟臣：《澳門通史》，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29。

- (12)(48)(51)(80)(87) 印光任、張汝霖著，趙春晨校：《澳門記略校注》，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頁150、；頁150-151；頁150；頁150；頁65；頁81-82。
- (13)(18)(19)(20)(30)(52)(56)(64)(65)(82)(88)(103)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澳門基金會，1995年。頁17；頁126；頁128；頁198；頁198；頁84；頁126；頁156-161；頁179；頁18；頁36；頁140。
- (14)(39)(40)(41) Maria Regina Valente：《澳門教堂》，澳門文化司署，1993年，頁47；頁87；頁43；頁74。
- (15)(42)(43)(44)(45)(46)(83) Domingos dos Santos：《澳門遠東第一所西方大學》，澳門基金會…澳門大學，1994年。頁7、頁40；頁38；頁40-41；頁42-43；頁42；頁44；頁45。
- (16)(26)(31)(32)(33)(36)(49)(50)(59)(61) 文德泉神父：《Toponímia de Macau》，卷一，澳門，Imprensa Nacional, 1994. p.123; p.89; p.90; p.125; p.125; p.125; p.99; p.99; p.103; p.109.
- (17)(53)(63) Maria Regina Valente：《澳門教堂》，澳門文化司署，1993年。頁48；頁74；頁82。
- (21)(27)(35) 龍思泰著，吳義雄等譯，章文欽校注：《早期澳門史》，東方出版社，1997年，頁23；頁22；頁55-56。
- (22) Maria Regina Valente：《澳門教堂》，澳門文化司署，1993年，頁89。
- (23) António Bocarro：《O Livro das Plantas de todas as Fortalezas, Cidades e Povoações do Estado da Índia Oriental》，1992, Imprensa Nacional - Casa da Moeda, Volume II, p.263.
- (24)(25)(25) 這一數字是相當高的，因為據龍思泰所說，當時聖安多尼教堂副主教的新薪也不過120兩銀子，見龍思泰著，吳義雄等譯，章文欽校注：《早期澳門史》，東方出版社，1997年，頁178；頁180-181。
- (28)(29) 孔德·德·阿諾索：“Jornadas pelo Mundo”，in “De Longe à China” 卷二，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88, pp.744-745; p.745.
- (37)(54)(71)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十九世紀，澳門基金會，1998年，頁229；頁273；頁87。
- (38) 查爾斯·博克瑟：“當時文件和繪畫表現的十七世紀澳門” (Seventeenth Century Macau in Contemporary Documents and Illustrations)，香港，Heinemann (Asia)，1984，第10號註釋，p.74。
- (47) 湯開建等編：《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紀實——近代報刊澳門資料選粹》，花城出版社，2001年，頁30-32。
- (55) M. Manuel Teixeira, <<IV Centenário dos Dominicanos em Macau 1587-1987>>, Fundação Macau, 1987, pp.5-7.
- (58) 施白蒂：《Cronologia da História de Macau》，卷三，澳門教育及青年司出版，1993，p.244。
- (66)(68) 譚世寶：〈澳門三大古禪院之歷史源流新探〉載於《文化雜誌》第42期，澳門文化局，2002年。
- (67)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部編：《近代史資料》其史史料〈澳門媽祖閣歷史告澳人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 (69)(70)(72) 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教育出版社，1997年，頁61-62；頁60；頁50。
- (73)(74)(75)(76) Jorge Graça, << Fortificações de Macau - Conceção e História>>,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p. 47; p.61; p.69; p.73.
- (77) 引自蔡田田、陳澤成：《澳門民居》，2001年。
- (78)(96) 轉引自湯開建：〈明代澳門城市建置考〉載於《文化雜誌》第35期，澳門文化局，1998年。
- (79) 轉引自(德)普塔克：〈澳門歷史概述〉載於《中外學者論澳門歷史》，澳門基金會，1995年。
- (81)(99) Jonathan Porter：<<Macau: The Imaginary City>>, Westview Press, 1996, p.71; p.81.
- (84)(94)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葡關係史資料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311；頁285。
- (85) 黃鴻釗：《澳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528。
- (86)(100) 龍思泰著，吳義雄等譯，章文欽校注：《早期澳門史》，東方出版社，1997年，頁189；頁36。
- (89) 轉引自李金明：〈十七世紀初葡萄牙在澳門的貿易〉載於《文化雜誌》第26期，澳門文化司署，1996年。
- (90)(98) Maria Calado, Maria Clara Mendes：<<MACAU - Memorial City on the Estuary of the River of Pearls>>, Government of Macau, p.65; p.62.
- (91)(95) 徐曉望、陳衍德：《澳門媽祖文化研究》，澳門基金會，1998年，頁29；頁36。
- (92) 張天澤著，姚楠、錢江譯：《中葡早期通商史》，中華書局，1988年，頁44。
- (93) 轉引自李金明：〈早期葡萄牙人在中國東南沿海的活動〉載於《文化雜誌》第34期，澳門文化司署，1998年。
- (97) 譚世寶：〈澳門媽祖廟的歷史考古研究新發現〉載於《文化雜誌》第29期，澳門文化局，1996。
- (102) Maria Costa：〈澳門建築史〉載於《文化雜誌》第35期，澳門文化局，1998年
- (104) 王振復：《中國建築的文化歷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197。